香港浸會學院中國研究學會

年刊

創刊號

專題：走向廿一世紀的中國

李思名博士惠存：

中国研究学会敬赠

九一年五月

目錄

發刊詞	周全浩博士
爲中國研究學會成立典禮題詩	謝志偉校長
專題：走向廿一世紀的中國	
前言	
走向廿一世紀的中國外交	丁偉博士
走向廿一世紀的中國經濟	胡敦靄先生
專訪	
研究中國經濟要抱一無所知的心態——專訪胡敦靄先生	
研究中國地理要多讀多看多思考——專訪陸昭明博士	
研究中日關係是說明中國近代問題的線索——專訪林啟彥博士	
中國社會不是特殊的動物社羣——專訪丘延亮博士	
校園生活	
主席隨筆	梁韋洛
回顧過去　展望將來	楊少潤
LONG MARCH TO "CHINA STUDIES SOCIETY"	Kwan Kei-leung
中國人—中研人—中國人	謝盛昌
中國研究課程的問題	林權
消費者是理性嗎？	足球小將
中研基督徒生活	JOHNSON
微弱的聲音	張少强
社會主義迷信	彩雲
六句說話	基斯杜化李夫

學術版

凱恩斯經濟學派及凱恩斯其人 張國樑

從中國傳統文化看
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及其意義 鍾謙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回顧與前瞻 無竹

書評：《朱元璋傳》 牛鬼蛇神

中國的政治漫畫 黎耀强編

創作版

致中研週年紀念 陳永康

詩作四首 陳荘

沉默

聽聽瘋人語 張少强

這個遊戲…… 微言

戰爭 超人

管光屏裏的生命 新青年

醒來吧 張國樑

歉 浪子

編後語 黎耀强

編輯委員會名單

鳴謝

發刊詞

中國研究課程主任周全浩博士

香港的社會，在面臨急劇的轉變，一九九七年之來臨，標誌著中港之間的關係，將日趨密切。屆時，中港的命運，將溶合爲一體。因此，香港社會對熟悉中國事務的人才，勢必需求日增。

浸會學院爲滿足此一需求，特開設「中國研究學位課程」，培訓此一方面的專才。一九九二年我們將有第一屆畢業生，投入社會服務。

「中國研究學位課程」的學生，在一九九〇年度成立中國研究學會，推動學術活動，提高同學們對中國研究的興趣。現特出版學術年刊，是一件極爲有意義的事情。

大專學界的教育方式，比較注重同學們自學，閱讀書籍、報章及期刊等；而對問題作思考及分析，論文的撰寫，提供很好的訓練，同學們不祇對所研究的題目獲得較深入的認識，亦學習到寫作的技巧，而且對於訓練思維的發展，也是甚有幫助的。

本會刊收集了學院同事及同學們所寫，有關中國研究的學術論文，旨在提高本課程的學術水平，激勵同學們的研究興趣，並且作爲與其他課程及大專院校的一種交流工具，實在是極有意義的。

對於參與編寫工作的同事及同學，我們致以熱烈的謝忱。

謝志偉校長

爲中國研究學會成立典禮題詩

永賦謝開課慶會
誌請志幕盛學導
四律偉博士之際院
一首以席成中
聞校長於國研
究

專題——走向廿一世紀的中國

前言

香港浸會學院中國研究學會於九一年四月十日假鄺翼之講堂舉辦了一次大型的公開講座，題目名爲《走向廿一世紀的中國——政治、經濟、外交、發展大計的探索》，目的是希望讓同學們從多方面了解中國現今情況，探索中國在政治、經濟及外交等方面會遇到的問題及今後中國應走的路向。

這次公開講座，我們邀請到香港亞太廿一學會會長、浸會學院社會學系高級講師黃枝連先生，浸會學院傳理系講師丁偉博士和經濟系高級講師胡敦靄先生任講座嘉賓，並邀請到我們的課程主任李思名博士（處理）任講座的主持。整個講座歷時約二小時，出席的同學十分踴躍，超過二百人。新聞界亦有派出記者來採訪。

首先由黃枝連先生就本講座作了一個導論式的介紹。他認爲隨着九七年的來臨，中英聯合聲名有關港人過渡期的問題，及最近中國外長和英外相磋商香港事務，都關係到港人於九七後，重新成爲中國公民，故此需要對中國有較全面的認識。另外，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所通過的《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亦對港人未來及海外華人產生重要影響。

黃枝連先生跟着向同學們介紹了研究中國所應參考的三類報紙：第一類是立場比較中肯的，如《明報》、《信報》等；第二類是英文的報紙，如《南華早報》；而第三類是一些親中的報紙如《文滙報》、《大公報》等。另外，他亦向同學們推薦了幾本新出版的書籍，包括《中國國情大全》、《香港眞論》等，這些書對我們了解中國國情和中國官員們對香港現狀的剖析，都很有參考價值。

接着，是由丁偉博士主講《走向廿一世紀的中國外交》，胡敦靄先生主講《走向廿一世紀的中國經濟》（講座內容見後文）。到最後本應由黃枝連先生主講《走向廿一世紀的中國政治》，可惜由於講座時間有限，以致黃先生未能發表他的研究心得。黃老師專長於未來學，是這方面的專家，運用未來學的角度研究廿一世紀的中國政治，必定有很多獨到的見解。現在同學們未能分享到黃老師在這方面的心得，很是遺憾！希望今後再有機會邀請黃老師發表他的研究成果。

最後，要多謝黃老師惜出這段時間和講堂給本會舉辦這次大型的公開講座，並多謝主持李思名博士、嘉賓丁偉博士和胡敦靄先生百忙中抽出時間參加這個講座。希望此講座只是一個帶頭的性質，以後本學會當會舉辦更多大型的講座和展覽，增進同學對中國事務的認識。

走向廿一世紀的中國外交

整理：王芸蕾

講者：丁偉博士

在這次講座中，丁偉博士着重討論了中國的外交政策。內容主要分三方面：

一、中國官方（包括中國對外政治研究學者對當前國際形勢的看法。

二、中國對當前面臨的困難、威脅的看法，從而了解中國在國際間的角色。

三、中國面對當前國際形勢，其未來外交政策的取向。

中國官方對當前國際形勢的看法

首先討論中國官方如何分析當前國際形勢。現今中國的政治評論家都强調自89年東歐發生一連串的劇變後，舊有的世界格局已崩潰，但新的世界格局仍未建立。所謂舊世界格局就是指自1945至1989年四十多年間，美蘇兩大强國對壘從而主宰整個世界的局面。過往中國常常擔憂因美蘇對抗而爆發戰爭，蓋兩國合共的軍事裝備足以摧毀整個世界，幸而這場戰爭並沒有爆發。另一方面中國又擔心美蘇聯手稱霸世界，瓜分世界，所以中國過去既害怕美蘇對抗又擔憂美蘇合作。但現在美蘇已不再對壘，東西方關係緩和，甚至開始合作，故此中國外交政策亦要作出適當調整。

雖然新世界格局仍是未知之數，但以下四點的發展情況卻是明顯易見的。

第一、因爲新世界格局未曾完全確立，形成了權力眞空（Power Vacuum）而助長了地區霸權主義興起。以往舊世界格局以美蘇爲領導，帶來一定程度上的穩定性，在過去四十多年間，美蘇兩國的互動都受世界關注，因爲一些地區衝突，甚至只是國家內部衝突都因美蘇介入而演變成國際矛盾，影響每一個國家的發展。如韓戰、越戰、阿富汗、柬埔寨問題本來都只是一些內部衝突，但因美蘇的介入而演變爲國際衝突。現在美蘇不再對抗，出現了權力眞空的情況，無疑是助長了地區霸權主義的興起，爆發局部戰爭的機會亦大大提高。未來幾年，因宗教問題、資源爭奪而爆發的戰爭會不斷發生，而中東波斯灣戰爭便是一明顯例子。

第二，鄧小平曾指出現今世界兩大矛盾就是東西及南北的矛盾。如今東西方衝突已緩和，但南北矛盾卻在加劇，即是指大國與小國之間的貧富懸殊不斷增加，大國仍然干預小國。如美國就以其雄厚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干預很多第三世界國家。

第三、未來的世界將會是多極化世界，是一個多姿多彩亦較混亂的局面。强權政治（Power Politics）依然起主導作用，各國依賴手中强權奪取利益。過去四十多年間，中小型國家雖欲向外發展，但往往受制於美蘇。而現今這阻力已消除，使地區强權政治的現象增加。

第四，中國亦强調現今意識形態的衝突已減弱，民族利益、經濟利益重新抬頭。其實過去幾十年是西方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壘，也就是馬列主義者與反馬列主義者的對抗，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衝突。但自從八九年東歐發生變革，社會主義政權一個一個的倒台，故此現今東西方意識形態的差別已減弱，民族利益的冲突却抬頭。西方政治家現在都非常關注民族主義（Nationlism）的抬頭，蓋民族主義一直都是國與國之間衝突的根源，但在過去四十多年民族主義問題却被忽視，意識形態因素涵蓋一切。如今民族主義重新受重視，是因爲東歐巨變，向西方看齊，採納了西方的民主政制及市場經濟，但東歐人前往西歐工作，卻受到歧視，被視爲二等人甚至三等人，民族主義因此在波蘭、捷克等國又興起。其實，民族主義有正負兩面的影響。共產政權最愛提倡民族主義，藉此加强國內凝聚力，形成人民排外情緒，是推翻帝國主義的有力武器，故民族主義有助民族解放。只方面民族主義亦有負面的影響，不論共產黨、史太林、希特拉均以民族主義爲借口來壓抑內部反對聲音，强調要團結一致，不可有任何反抗勢力，這無疑是危害了國家的民主發展。

中國面對外間威脅的應付方法

以上分析了中國官方對當前國際形勢的看法，接着討論中國邁向九十年代，在這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中，如何對付來自外間的威脅。

近年中國大陸的出版物大部份都集中講述「和平演變」，我們發覺現今領導人的心態、對世界的看法和四十年前沒有多大轉變。五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皆强調帝國主義正千方百計推翻新興的社會主義政權。直至現在這觀念在中國當權派的腦海中仍沒有改變。在六四事件後，中國官方不斷强調美國總統布殊在89年5月12日的講話，他在講話中提出了「超越遏制」（Beyond Containment）的觀念。其實，'Containment'是五十年代美國對抗共產國際陣營的政策，即是以政治、軍事手段圍堵蘇聯、由東北、東南亞、南亞至中東、歐洲形成弧形的防線以阻止中國、蘇聯對外抗張。而現在布殊强調不再採取强硬手段，轉以政治、經濟、文化、學術等的交流去影響社會主義國家。所以中國官方不斷强調美國由五十年代開始直至現在都想消滅共產政權，只不過以前採用强硬手段，現今則用「軟刀子」政策。總言之，中國領導層一直都認爲主要的外間威脅來自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而此觀念一直影響着中國外交政策。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强調獨立自主，反帝反修正主義，故採取獨立外交政策，積極聯絡第三世界國家，這時中國政策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文革時期，中國認爲自己推行的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應協助解放全世界無產階級。

但到了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執政的十年間卻强調國內現代化，重視與西方國家的交往，採取務實外交政策，而忽略了第三世界，與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政策相比有急劇的轉變。

89年後，江澤民、李鵬新體制剛掌握權力，面對着國際形勢的劇變，美國成爲大贏家，中國外交政策亦重新重視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交往，另一方面，中國又不能擺脫與西方的關係，中國既希望打破僵局，突破制裁，要求西方恢復對中國的正常經貿往來，但又努力排斥西方對中國政治、文化藝術的影響，因此現今中國對西方的外交政策實有很大的矛盾。

中國未來外交政策的取向

最後，我們要討論的是面對轉變中的國際形勢，中國外交政策的取向。若要分析此點，必先了解以下幾個問題：

一、過去是兩極世界，未來是羣雄並起的世界，究竟美國在新世界格局中扮演什麼角色呢？

二、新的「極」、新的強國如德國、日本在國際中又扮演什麼重要角色？明顯地，德國日本不在停留於經濟大國，而會成爲政治大國甚至是軍事大國。這對中國外交政策有何影響呢？

三、蘇聯內部動蕩不安，戈爾巴喬夫面臨下台威脅，對中國又有何冲擊呢？

美國前總統基辛格主張一個五極的世界（即美、蘇、中、日、歐洲），但在未來世界中一個新三角（即美、日、歐洲），將起重大作用，而在這新世界格局中美國佔有領導地位。美國非常强調聯盟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來可維持她與其他强國的關係，又可約束德國日本，亦可借助別人力量減輕本國軍事，經濟的負擔。其實，在新世界格局中，中國的國際地位正在下降。在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國雖落後但卻是美蘇爭奪的目標，美國既不希望中國幫助蘇聯，蘇聯亦不希望中國偏向美國。但現在美蘇不再對抗，中國對美蘇的戰略及政治利益都不若以前重要，因此其國際地位亦相應下降。雖然西方國家紛紛撤消對中國的制裁，但並不表示中國國際地位有所提升，西方只視中國爲一個擁有十一億人口的大市場而已。

此外，中蘇關係及中美關係都是我們要留心的問題。中國十分擔憂蘇聯內部動蕩不安，一方面會波及中國與蘇聯接壤的地區，另一方面又會助長美國的擴張，故中國希望幫助蘇聯渡過難關，如向蘇提供商業貸款。另外，中國既欲阻止美國對外抗張的意圖，但又非常重視美國在亞洲的地位，中國希望美國能牽制日本，及防止因蘇聯不穩定而爲亞洲地區帶來的種種動盪，因此，中國在意識形態上反對美國「和平演變」策略，但對中國外交政策來說，華盛頓的作用依然重要。

專題

走向廿一世紀的中國經濟

講者：胡敦靄先生　　整理：黎耀强

中國經濟過去十年的失誤

要分析中國經濟未來一段時期的發展，必須要總結過去十年發展的弊病。總括來說，過去十年最大的失誤，是中央政府未能掌握間接調控宏觀協調前，就迅速全面地把決策權下放，而這最後是關係到所得分配的問題。所得分配關係到中央和地方的分配、關係到不同職業、工作部門的所得分配，這些所得分配機制若不合理，會進一步影響到資源調配的機制。

未來一段期間，中國政府若仍未能建立一個有效調控宏觀經濟活動，任何的迅速分權，只會做成放權和收權的惡性循環。

現在中國經濟政策的領導層，已對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毛病，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有一定的共識。他們已能正確斷症，而且逐漸知道治病的路向和手段，但仍然未能理解和判斷藥劑的份量和下藥的時序。事實上這些都是現時經濟學家急欲解決的問題——半封閉半開放、指令與市場力量並存，多種經濟體制同時運作的經濟制度的運行，聯繫和協調機制是怎樣的，如何在這麼複雜的制度下穩妥地推行經濟自由化，加大間接協調的比重？這些只能透過大量的理論研究工作以及非常審愼的實驗來測試，經過反覆的篩選、修正和驗證來探索出可行的方案。必須强調的是上述的實驗必須以理論來指導，切忌摸著石頭過河，避免犯上一刀切，以偏概全的錯誤，在總結和推廣時必須超越試點的微觀侷限，從宏觀的以至全國的層面來評核成效和執行的困難。

從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政府在吸收了過去十年，特別是自八四年開始的「中央心中無數，摸著石頭過河，地方各行其是，各取所需，視穩定爲保守，一切爲體改服務，而體改就是迅速和全面的市場化，經濟效益等同利潤極大化」的經改的教訓。爲着達致長期的穩定而協調的經濟增長，中國政府希望在維持穩定的前提下，先搞清體制轉軌的問題，據此制定可行的經改方案。總之，經改必須在受控和可控的情況下進行。爲此，中國利用八九和九〇年經濟調整政策所帶來的相對寬鬆的經濟環境和人民通脹預期較低、頭腦不那麼發熱以及比較認識過去經改弊病的契機，爭取在一兩年內全面性探索中國應用那類宏觀經濟協調機制。

從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看中國的未來經濟政策

中國現正全面總結十年經驗，開始去探討未來宏觀調節的次序，例如貨幣流通機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從整個「八五」報告看，是以穩定爲主，强調發展的目標在達致長期持

專題

續穩定和協調的經濟增長，避免大起大落。關鍵在優化產出結構，提高經濟效益和維持社會穩定。在一兩年內，以搞企業組織改革爲主，提高效益，其他方面則以理論探索爲主，輔以審愼的實驗。如果這幾年內一般經濟表現較佳，才進行第二步，這最快要在「八五」的後半期，可以逐步在理論指導下試行對宏觀機制的改革。

在試行前，中國政府會搞一些非經濟改革的配套，如房地產改革、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

中國原本的社會保障制度只包括國營部門，而主要以中央政府負責，而農村和集體勞動則不包括在內。所以如果要落實企業破產制、地方自負盈虧等幾乎是不可能，因爲在舊的保障體制下，工人失業後便沒有有效的社會保障。中國如果眞想打破軟預算約束所導致的通脹危機，要給企業足夠壓力以提高效益。最大的壓力當然是倒閉危機的壓力，但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坐視企業倒閉後，工人因爲失業而不能維生，因此要推行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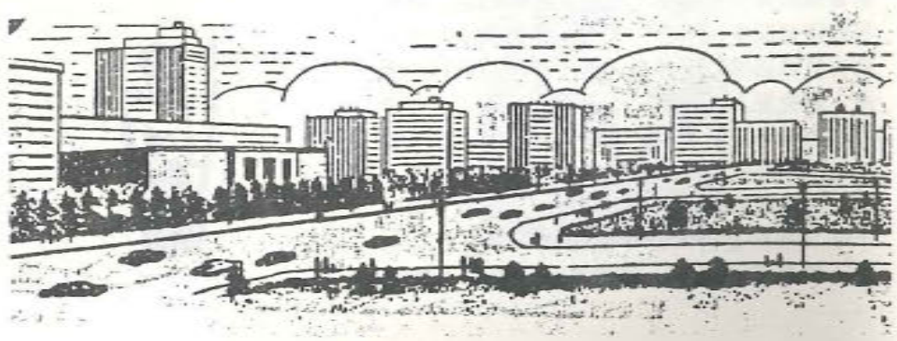
房地產改革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比較便宜的價格供應房屋，使人民樂意購買，從而吸收社會的資金，使政府能掌握更多資源，有利於調節經濟結構和總需求水平。

若此二者做得較佳，一方面可吸收社會的閒餘資金，中央政府控制的財富較多；另一方面，保障制度逐漸建立，失業所做成的害處減少時，第二步所要做的是改革和完善間接宏觀調控機制，然後才開始推行企業自負盈虧的體制，但這最快要在八五計劃的後期才試行，而且會試行得十分小心。

中國現時的當權者，對政策效應十分敏感。他們亦知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並非放權不足，而是宏觀失控。地方部門和企業往往由於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損害整體的利益，這些是中央政府最耽憂的。

事實在九〇年，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已非推行緊縮政策，這是中國經濟所面對的其中一個矛盾，因爲假若繼續推行嚴厲的緊縮政策，中國的財政收益（很大程度是企業上繳的稅和利潤），自然減少，而國家仍須支付龐大的價格補貼，以致九〇年的財政赤字非常大，達一百五十億。可見繼續加强緊縮，會做成政府收益越來越少，政府財政赤字越來越大，最後會加强潛在通脹的壓力。

中國在九〇年初其實已開始放寬銀根，到六月市場開始重新活躍，但活躍後又出現問題，由於現時民間持有大量資金（約佔中國總銷售額的八成），所以在放寬信貸工資和總需求增長的控制後，十一月通脹又上升至6-7%，有些地方甚至達10%。中央政府在十二月開始又重新緊縮銀根，這比從前敏感得多，只要物價顯著上升便立即加强緊縮力度，相信最少在短期間政府在處理物價和金融體制改革方面仍然會十分小心，只會逐步試行。預料在這一兩年內國內的通脹問題不會太大，這主要由於：第一、八九、九〇年緊縮的效應做成原材料供應相對寬鬆。第二，一般人對通脹的預期還偏低。



國際形勢對中國經濟政策的影響

除了內部經濟政策外，國際政治格局的轉變，也會影響未來幾年的政策。最關鍵的有兩件事：第一、波斯灣戰爭的影響，第二、是歐洲的轉變。

波斯灣戰爭的影響，是中國會增加軍備的投資。這件事件從中國角度來看，有很壞的影響，因爲美國和西方可以很容易透過聯合國糾合軍隊。如果中國國防薄弱，它們可能趁機發動戰爭，干預中國內政，迫中國接受不合理的條件。事實上，中國的「八五」計劃和十年規劃重視對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將怎樣協調中央和地方的發展，提升至關係國家統一的層面，這點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加强軍工業的發展，特別是電子工業。

至於未來歐洲發展的影響就更加深遠，在短期間對中國有利，因爲東歐經濟狀況的惡化，使未來準備投資到東歐的資金，會回流亞太區。若果東歐改革成功，歐洲經濟變爲一體化，這樣美國的影響必定大大下跌。西歐已不需要依賴美國對抗蘇聯時，東、西歐一體化後，合起來的經濟力量比美國强，美國的影響必然減少，這點我和丁博士的看法不同。基辛格之所以要美國盡快重新拉攏中國，他是看到無論東歐的政經狀況變得好與壞，都對美國不利。如果東歐經濟狀況惡劣，美國有道義支持東歐，需要動用鉅額金錢來支援東歐，會做成美國財政困難。若東歐經改成功，東西歐聯盟，其經濟實力比美國强，爲何還要聽命於美國？其實，這次美國要發動波斯灣戰爭的政治含意，是希望藉此重建其霸主地位。當歐洲已開始脫離美國，而美國要返回亞太區，自然會產生日本和美國對抗，無論是日本或美國，必須得到中國的支持，才可以確保領導地位，因此，中國在這方面會得到益處。

總之，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最重要是它能否建立和有效地操縱協調機制，特別是能否重整比較合理的架構至爲重要。

研究中國經濟
要抱一無所知的心態——
專訪胡敦靄先生

訪問：董志輝、張國樑　　整理：董志輝

相信各中研同學對胡靄先生這名字毫不陌生，但對於其個人資料、爲什麼對研究中國發生興趣及原因、研究中國經濟的心得，及對中國研究課程的期望等問題，大家都很有興趣知道的。所以爲了多方面去了解胡敦靄先生，我們中國研究學會特別爲他做了一個訪問。

求學歷程

胡敦靄先生出生於一九五零年，未婚，一九七三年畢業於中文大學，一九七七年取得碩士，而他的碩士論文題目是：研究來自中國的進口食品對香港出口的影響。其實，胡先生中學畢業時是讀理科的，但他反而較爲喜歡歷史，因此他在大學一、二年級時是主修歷史，副修經濟。而據他的看法，歷史是可憑自修的方法去讀，所以他便於三、四年級時轉了主修經濟，而副修歷史。據他透露，他眞正喜歡的是廣義的社會科學，所以才有上述轉修的情形出現。

大學生活中，胡先生比較强調自學精神，他認爲課堂只是針對一般學生，而老師的作用乃是帶起有關問題，進而提高你的興趣，刺激你的思考，所以在看書自修有問題時可先問老師的意見，把老師的看法作爲參考的基礎。因此胡老師並不那樣重視各中研同學的課堂出席率，他在大學時也很少上堂，但他叮囑同學們在自修之餘也最少要知道老師要教些什麼，否則自修是沒有意義的。

胡先生未在浸會學院教書之前，也曾在外面工作及教書，那是他剛在大學畢業後的一、二年間。而他是在七九年夏天九月間進入浸會工作，屈指一算，已有十二年了。當問及他現在正研究什麼，他答道他正研究一向令中國政府，不！很多共產國家包括蘇聯都感到十分頭痛及困難的問題——中國物價波動和改革的研究。

對研究中國發生興趣

從小學時，由於受當時右派的影響，胡先生已開始注意到中國的發展。而認眞對研究中國發生興趣，說起來是在中學畢業時。這時乃六十年代末，中國正發生文化大革命，連帶香港也出現動盪不安。這時中國的變動對胡先生而言，是有一股無形的吸引力。在研究任何制度時，胡先生指出，首先要理解制度的特性和它的基本運作機制，找出它的弊病，更要從比較其他可能性當中鞏固有關的基礎知識。而一般同學較易犯錯的地方，就是對於某制度一知半解、模糊不清時，便下了一些錯誤的結論。所以，在研究初期，打好基礎知識是第一步。

如何運用統計資料

我們又問胡先生，在研究中國經濟過程中，難免遇上不少的統計資料，如何能避免受一些錯誤資料所影響呢？胡先生的答案是要眞正去做一套錯誤的資料，從理論來講，是可能的。就中國的統計資料而言，七八年以後的資料可信性較高。而六零至六一年及六七至六八年的資料較爲需要用多一些時間去處理，因前者是大躍進，後者則是文革期間，很多統計資料在這兩時期分散了，而中央政府又缺乏完善的監察。因此基本上，我們很難取得足夠的數據並去鑑定其眞確性。至於如眞的要去鑑定統計資料的眞確性，胡生認爲應從兩方面入手。第一方面是要根據經濟理論和中國國民經濟的重要比例關係測試官方統計資料是否合理，例如加總各成份單位的產值看是否和所屬部門的總量一致。第二方面，就是從實際的經濟情況去鑑定。例如假若統計資料顯示消費水平上升，我們要去調查這地區在當時當地的生活水平的變化是否與有關資料相符。因此必須强調實地的調查及了解。以胡先生印象而言，這個方法比較準確。

研究中國經濟的心得

提到研究中國經濟的心得，胡先生認爲我們首先要使自己有着甚麼都不知的心態，即胡先生在我們經濟學原理第一堂時，表示慢慢地我們會發覺自己甚麼都不知，就猶如一個白痴了。回歸正傳，我們先要從歷史入手。從明朝的歷史開始研究，因爲正是從明朝中葉開始，中國的科技，以至經濟發展逐漸迅速地被西方拋離，我們希望以歷史入手，探索出中國經濟相對落後的原因。但若果同學們覺得對研究早期中國的社會、經濟沒有多大的興趣，胡生覺得最少我們要從鴉片戰爭時期開始研究，因爲西方列强對中國的侵略及凌辱對後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有相當大的影響，它幫助我們理解執掌過往長期受屈辱的國家的執政者的心態和意向。在觀察歷史過程中，我們暫時不需加任何意見，然後才去思考其原因。我們可以社會變遷及發展經濟學等方面的理論來幫助我們了解一個發展中國家經常遇到的問題。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但和其他發展中的第三世界國家一樣，若初時政策執行得頗爲成功，往往會使執政者的信心過份膨脹，而錯誤地加快推行政策因而造成危機。第二方面，在批評及比較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時，例如在中國研究中，我們要把中國和具有類似發展水平以及經濟條件的國家相比，據此我們發覺中國的經濟發展的表現和已達致的條件並非如一般香港人所想象中那麼差的。假若將中國和一些先進的國家比較，如美國，這種比較是沒意思的，因爲它抹殺了中美兩國經濟發展的起點非常懸殊的事實。

胡先生強調，當我們試圖應用理論去分析中國情況或作方向性的預測，我們須要參考社會變遷、比較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論說。我們應該時常研讀和留意，當看到了中國歷史和最近發生的事情，在研讀和觀察的過程中，毋須理會旁人的意見。因爲同學們很容易受到某意見的影響。在未了解事件的眞相，便完全接受了某些特定的看法；而事前專注於研習某些理論來分析問題，很容易令你有「先入爲主」的觀念，對客觀分析做成很大的壞影響。因此，我們首先須從多方面去觀察這事件；然後再思考前面提到的社會變遷、經濟發展及比較經濟學的理論能否幫助我們去分析和理解有關事件。

胡先生再次趕到利用統計資料可幫助我們去分析中國經濟的實質情況。分析這些資料是比較正確的途徑去了解中國經濟的增長情況。不過要注意到兩方面的配合，一方面需要掌握具體資料，但另一方面，也要了解整體的發展趨勢和它的基本特質。我們先要清楚地界定研究的目的，然後才能確定尋找那些資料，以分析資料得到有關研究課題的特質進一步了解問題所在，進而也可知將來的研究方向放在那處。

談及同學們在研究中國問題方面經常犯的錯誤是太急於應用一些剛剛學會的理論去分析問題，而忽略了理論背後之假設是不適用於中國實際情況。可是他們卻不願意費較多時間去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便生硬地套用不適合的理論、模型來評論，其中一些更妄自尊大，造成頗壞的影響。在此胡先生舉了一些例子。他談及中國沿海的知識份子，甚推崇西方，把西方的一套，毫不保留地完全接受，有甚於香港。如果我們問他們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並把他們的看法當作國民的主流意見，往往會造成誤導。所以我們以爲毫無選擇地可從一些內地知識份子中（特別是一些和我們有相同傾向的）絕對準確的得到一些符合國情，反映主流意見和很有建設性的意見的如意算盤，並非時常能打得響。胡先生也提到在研究中，要注意絕無一套理論是可以全面地、正確地解釋中國的問題，也不應存着那些說法比較好，那些不好的心態。倒不如說某一環境能提出比較合理、中肯的分析。即是說，我們要從多方面去理解一個問題。

對中研同學的印象

談到對中國研究同學的印象，他說同學的一般表現尚好。但是課程本身是存在一些問題有待解決。由於經濟學導論這一科包括非正統經濟學，它對學生的需求超過一般大學開設的經濟學原理，可是各專業同學的經濟學基礎參差不齊，對一些未曾學過經濟的同學，這課程可能較深。若教得太快，他們可能追不上進度；而若教得太慢，對已修讀過經濟的同學而言，實有把進度拖慢之嫌。所以要取得兩方面討好，實是一大難事。對經濟專業同學而言，胡先生並不太擔心這課程對他們的影響，因他們將於二年級有更多機會去接觸經濟學。使他擔心的便是那些可能是唯一機會接觸經濟學課程的其他專業同學。他認爲解決的方法是分組地去上堂；對於經濟學專業同學，可以把課程重點放在以經濟學作分析工具方面去教，而其他專業同學可照一般大學的經濟學原理去教，但他們也可以選修經濟學專業的組別。

研究中國地理要多讀多看多思考——專訪陸昭明博士

訪問者：黎耀强、梁佩珠、謝盛昌
整理：梁佩珠

在浸會學院地理系內，有幾位高級講師和講師，均是研究中國地理方面的專家；而對於中研同學來說，較爲認識的，可能是陸昭明博士，因我們第二年的共同必修科目《中國區域地理學》是由他任教的。上過他課堂的同學都知道，他除了對中國地理熟悉外，對其他方面如中國政府推行的政策、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等，均有獨到的心得，在課堂時每每能就中國各方面的問題發抒己見，令同學得益不少。

授課之餘，陸博士亦很鼓勵同學們到他的辦工室請教，對喜歡發問、思考的同學，他尤其欣賞。但可惜我們除了知道他是研究中國地理方面的專家外，對他的個人資料、爲何對研究中國地理發生興趣等，知之不多。爲了加强同學們對這位和中研同學關係密切的老師的認識，我們特地走訪了陸博士。

求學歷程

陸昭明博士現年三十六歲，已婚，並有二子。一九七四至七八年就讀於中文大學地理系。七八至八〇年在中大任全職助教。八〇年前往美國密芝根大學進修，在八二年完成碩士課程。接着在八二至八八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完成博士課程。在八六至八八年間，他曾回香港中文大學，接受了一份爲期三年的任教合約，主要原因是爲了幫助完成自己的博士論文（研究廣東省地區的發展）。在八八年，他再回明尼蘇達大學，參加了論文答辯，並成功地獲得了博士的名銜。

至於陸博士是在何時在浸會任教？其實他

在八九年秋才加入浸會學院任教。第一年的工作大多和中國有關，亦與他在地理方面的研究有關。到第二年的時候，情況卻有點改變。隨着對地理技術要求的增加，電腦科技便開始引入地理的學術研究中。Remote Sen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等便逐漸爲人所重視。陸博士此時亦負責教授這些儀器和新科技的操作、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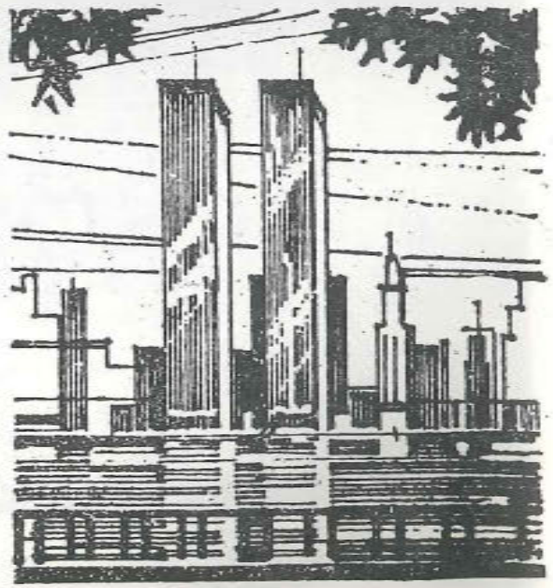
研究中國地理的原因

研究地理，陸博士爲何會選擇研究中國，而不研究其他的地區呢？其實陸博士早在七七年時便對研究中國發生興趣。他的碩士、博士論文的主題亦和中國有關。他認爲身爲一個地理學研究者，是有責任去了解自己的世界，而最先我們必先要去了解自己最近的地方。再者，因爲香港鄰近中國，故此在資料搜集方面亦十分容易。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陸博士研究中國，並非出於偶然，而是經過深思熟悉的抉擇，並帶有一些民族感情。

陸博士既然是研究中國，卻爲何跑去老遠的美國去作研究，而不留在香港繼續研究呢？陸博士答道他在七七年已對研究中國地理發生興趣，但在當時中國不是十分開放，因此許多資料也不能搜集得到；但反觀在西方國家則比較容易獲得有關中國的資料。再者，西方國家的技術比較發達，在方法學上比中國先進。因此，八〇年他便決定從美國進行其研究中國之學習。隨着時光消逝，中國大陸比較開放，而在香港亦十分容易獲得有關中國之資料，故此他便於八九年回港繼續對中國之研究。

研究計劃

而陸博士現在研究中國的計劃方面，有以下幾方面：首先他參與了一個有關中國地區經濟發展的合作計劃。有關的工作現已大致完成，並且將會推出二册有關是次計劃的研究成果，作全球性發行。參與是次計劃的，除了陸博士外，還有一位香港大學的地理系講師、二位中文大學經濟系講師、中國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教學及社會經濟研究所亦有協助。另外，陸博士又參與了一個「中國生產力發展」的研究計劃，此計劃由浸會學院及香港大學合辦，是研究有關珠江三角洲投資對香港之影響。此外，他又與廣東統計局、華南理工大學及香港大學合作一個研究中國發展模式之先導者的計劃，這可說是其博士論文之補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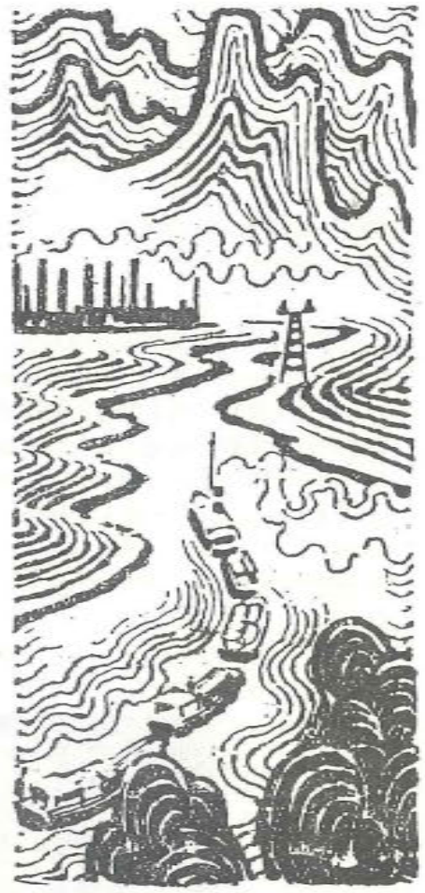


研究中國地理的心得

接着，我們請教陸博士研究中國地理的心得。他認爲研究中國其實有許多困難。首先中國土地遼闊，故此研究中國地理的範圍也是非常廣泛；再加上進出中國的困難，使研究中國的實際工作上有所阻礙。

研究中國時，他希望同學們要注意不要只探求那些表面問題，應多讀多看有關之雜誌，盡量充實自己，並參與多些學術性的討論，多些思考和分析問題，漸漸地同學們會發現研究中國地理也並非想象中那麼困難。

如果機會許可的話，我們應爭取與中國內地之學者交流心得，因爲中國內地之學者對中國有更深的認識，而能補充香港學者之不足。他吩咐我們暑假上清華大學時，應在講座中多發問問題，多與當地學者交流，從而增進自己對中國的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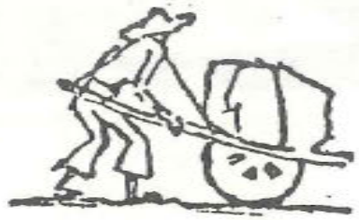


對中研之意見

最後，我們詢問了陸博士對中研同學的意見。陸博士答道，雖然他已任教中研同學兩年，但由於多是大堂，故此不能對每個同學有深刻之認識及交流。但他在今後會努力的去增加和同學之交流及給與他們多些研究上之分享，從而希望幫助我們的學習。

他强調中研是浸會的皇牌，因此希望中研的畢業同學能不負所望，尤其是第一屆的畢業同學，希望我們的成就能令人側目。

看來我們第一屆的畢業生負擔又要加重了！



研究中日關係
是說明中國近代問題的線索

——專訪林啟彥博士

訪問：黎耀强、張國樑
整理：黎耀强

修讀過林啟彥博士課程的同學，都會對其雍容不迫的授課方法、一派學者風範的外表，留下深刻的印象。對中國研究的同學來說，他亦是和我們關係最密切的歷史系老師，因我們一、二年級的共同主修科目《歷史學導論》、《近代中國的基礎》，都是他主教的。爲了加深同學們對林博士的認識，我們《中國研究學會會刊》特地和他做了一個訪問。

簡歷

林啟彥博士，一九四七年生，已婚，有二子。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文學士、碩士；日本廣島大學東洋史系博士課程修業完結；香港大學文學院哲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文化史、中國近代史、近代中日關係史、政治思想史、學術思想史等方面的教學與研究。主要著譯有：《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與譚汝謙合譯）、《三十三年之夢》、《中國學術思想史論綱》、《步向民主——中國知識份子與近代民主思想》等。林博士自一九八一年開始在浸會任教。

中大學習與研究

林博士在六五年進入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修讀。當時的中大由於是組成的初期，各學院的教學重點有很大的獨立性，而新亞書院的歷史系，較專長於中國的古代史方面的教學，此外，如經濟史、學術思想史、制度史和中國歷史地理也很出色。林博士當時是主修歷史、副修中文。

林博士在中大歷史系畢業後，繼續在該校的研究院攻讀碩士。他的研究院畢業論文爲《留日學生與辛亥革命》。當時他跟兩位老師作研究，一位是陳荊和教授，另一位是王德昭教授。陳荊和教授是日本史及東南亞史專家，而王德昭教授則是中國近代史方面的專家。林博士受到此兩位老師很好的學術訓練和薰陶。他選擇《留日學生與辛亥革命》爲研究的主題，是因爲希望把這兩位老師的專長和學問結他合起來，兼收並蓄。

留日學習

在論文寫作期間，林博士感到中國頗缺乏一些能兼通中、日兩國近代歷史的學者。而要說明中國近代的問題，中日關係卻是相當重要的線索。所以在研究院畢業後，林博士便選擇留學日本。

留日期間，林老師對中國近代民主思想的興起與留日學生的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興趣，於是把研究的重點放在西方近代民主之思想如何經由日本的思想界通過中國留學生傳到中國的過程的問題上。

林博士指出，日本的現代化比中國起步約早三十年，日本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便翻譯了大量的西洋書籍，學習西方各國各派的學術思想。早期中國的知識界，只有少數人能從西方直接學得新知識新思想，而多數人卻要透過日本知識界作爲中介角色去了解西方的事物，例如盧梭《民約論》的理論和學說，便是留

日學生從日本的譯介的書籍翻譯過來的。

晚清的中國爲何需要派學生留學日本，爲何要以日本爲摹倣的對象呢？其實，英法美這些西方國家最先接觸中國，但對中國的影響卻遠不及其對日本的影響。中國當時的統治者和多數的知識份子認爲中國只需要學習西方的科技與軍事的知識，便能抵禦西方的侵略。但經甲午戰爭慘敗後，他們發覺到單憑船堅炮利，仍不足以獨立自强。日本同樣是學習西方，但她能比中國全面地學習西方的先進知識文化及制度，眞正掌握了西方的富强之道。因此中國人要以日本作爲迅速近代化的樣板，轉而向其學習成功之道。

清末提倡留學日本作爲迅速富强中國的途徑及方法的知識份子認爲留學日本有四項優點，即：一、路程近；二、不需花費太多金錢；三、日本文字和中國文字接近，學生較易學習；四、日本已是一個學習西方的成功例子，而中國與日本在思想及文化上又較接近，因此較容易從日本的近代化經驗中，取得借鏡之處。

研究嚴復的原因

林老師在上課時，經常提到嚴復是他所敬佩的中國近代學者之一。林老師解釋了他敬佩嚴復的原因。林老師認爲在近代中西文化接觸後，中國的知識份子基本上都是生活於中西文化的冲突和夾縫中。他們一方面深受傳統中國文化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又要對侵略中國的西方世界的知識文化努力學習和吸收，否則將無法生存下去。這種心理狀態，使不少的知識份子感到無奈和迷惘，找不出一種平衡之道來面對這種中西文化相冲相剋的困局。

不少知識份子認爲只需干脆用西方那一套改造中國，何必留戀中國的過去？主張此說最力者如胡適、陳獨秀等人。但是也有人反對放棄傳統中國的文化，如劉師培、章太炎等。而嚴復卻相信，中西文化可以相互調和，互補長短。嚴復對西方文化和學問造詣之深、視胡適、陳獨秀等人尤有過之，而他對中國傳統舊學術的根基之厚，亦不在劉師培、章太炎等人之下。以這樣的條件和學養來討論中國文化的出路及中國富强之道，才能有客觀、科學而理性的見解。

清末的中國，其實最需要一些既對西方文化有深厚認識，對中國文化也受很深薰陶、像嚴復這類人物，能清楚近代問題的關鍵所在，爲中國指出謀求富强的正確之道。可惜此類人物實在不多。康有爲、梁啟超倡導變法的時候，對西方文化了解不深；而胡適、容閎等雖留學西洋，卻對中國傳統文化頗感隔離；他們都不是解決中西文化衝突問題的理想人選，遑論爲中國指出成功的近代化之道。而嚴復則是少數對中西學術文化有深刻認識的知識份子，二者的優劣長短可謂瞭如指掌。林老師建議同學們好好地研究嚴復，從他的身上找尋更新中華民族和富强中國的寶貴思想和意見。

除了嚴復外，林老師亦有研究孫中山。林老師認爲孫中山的思想中也有許多寶貴的遺產，可爲中國的未來展示正確的方向的。

對中國研究課程同學的意見

最後，林老師談到對中國研究課程的期望。他期望本課程能訓練一批既對中國近代歷史，又對中國現代情況有豐富的學識和卓越的見解的專家，亦希望中研的同學能對今後的中國以及香港的繁榮和進步作出貢獻。看來林老師對我們的期望頗大！

至於他對中國研究的同學，有什麼印象？他認爲我們同學的中國感比其他系的同學强些。但似乎感性方面的表現比較强，理性方面的表現比較弱。他希望同學能以中國人的立場同時以理性的態度看待中國問題。他指出，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包括澳門）這三個華人社會經過一百、幾十年的分離及各自發展，必然有各自的優點長處，但也有各自的缺點與局限，我們同學應該好好學習如何吸收這三個華人社會的好處，爲未來統一而富强民主的中國找出建設的基礎。

中國社會不是特殊的動物社羣——

專訪丘延亮博士

訪問：張國樑、梁碧華、黎耀强
整理：梁碧華

浸會學院社會學系，這年來了一個新講師。他有頗肥胖的身材、廣東話「唔鹹唔淡」、外表不修篇幅、有時和學生很玩得來、有時卻十分嚴肅，他就是丘延亮博士。修讀過他的《當代中國社會》課程的同學，大概都領受過他的嚴謹治學態度和對邏輯思維的嚴格要求。對這位頗有個人風格的老師，你們對他認識又有幾多呢？

求學歷程

丘延亮博士，生於一九四五年，現年四十六歲，已婚。他是在台灣長大的，六七至六八年就讀於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七九年後往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進修，並獲碩士和博士學位。他雖然以研究人類學爲主，但對其他方面，如職業社會學、工人運動、社會運動、都市社會學等，都很有研究的興趣。近年來，他主要研究在香港的跨國企業中的工業糾紛。

考古人類學對我們來說可算是較冷門的科目，爲何丘老師會選擇這門學科鑽研呢？首先，他認爲人類學是在社會科學裏較年輕的科目，因爲它的年輕，故教條少，自由度較大。另外，亦因爲它的年輕，尚未定形，故包容性較大，站在人類學特定方法學的立場，它可和其他學科一齊應用。事實上，他所研究的人類學，是屬現代社會的人類學，研究主要對象是現代的工商社會，而不只限於原始民族或一些孤立細小的部落社羣。

丘老師是在台灣長大的，在美國讀書，但爲何會老遠的跑來香港教書？主要原因是他是在香港做研究的，也曾在香港大學教書，剛巧

有一個機會給他在香港任教，故他就決定留下來了。另外，香港正處於過渡期，對於研究社會或者具體社會現象的人來說，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地方；在這個大轉變的年代裏，會出現很多的未知之數，會有很多不能夠預料的事情出現，故從研究興趣來說，這是一個很值得做一個參與的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地方。因此，從其所學的東西和興趣方面來說，這都是他運用所學的機會。

有關理論的問題

丘老師曾經說過他很反對有些人用一些西方的理論套用在研究中國方面，那麼這是否有需要發展一套適合中國本身的理論呢？

首先，他答道他是非常反對套用理論的，因爲理論基本上是在特殊情況下對特殊情形的解釋。那解釋由於是特殊性的，若套用爲普遍性的東西是錯的。具體的問題必須具體的研究，故這不是東方或西方的問題，而是套用理論的方法基本上是不對的。換言之，理論不但要學，且要學深學廣；更要敏感到已學的所限；切不可冒然套用、掛一漏萬，以偏蓋全。

另外，有沒有需要搞出一套中國自己的理論呢？他認爲中國不是一個人類社會以外的特殊動物社羣，它是一個人類社會。人類社會有其普遍性，中國地方自不例外。不過，中國社會如任何社會一樣，也有其相對的特殊性，具體探討中我們當不可忽略。中國地方是那麼大，有那麼多民族，所以將它本身作爲一個概念，統一爲一個研究對象是有問題的。第一，中國實在太大，有那麼多方面和種種問題，具體的社會研究中，我們只能選擇某部份去研究。第二，中國本身不是一個學科，它只是一個研究對象，而研究對象是不可爲學問的性質和認知的取向下定義的。恰相反！研究的方法和指向才是界定問題性的尺度。

對實地研究的經驗

在人類學中，實地研究（field research）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而我們對此多數不大認識，故此我們詢問了丘老師對這方面的經驗。他認爲 field research 的做法最重要的是直接參與，從而熟習研究對象的社會，包括生活方式和語言風習等。另外，還需要在所研究的社會中生活一段時間，學懂他們的觀點、概念方法等。但時常會碰到不易投入和受排斥的情況出現，因此要取得那些研究的對象對自己建立信賴，才有成功的可能。

另外，人類學家是有很嚴格的信條要遵守的，例如所發表的東西一定不可附研究對象的眞實姓名，避免他們因此而遇上麻煩或受到傷害。因此，做 field research 以前，他們一定要宣誓，作爲人類學家在道德上的承諾。

而丘老師本人的 field research 經驗，可說多不勝數，較特別的有八六年往波蘭研究當地的農村經濟和農民生活，八九年五月往北京研究社會運動，九〇年往歐洲研究社會主義制度的轉變等。

政治態度

熟悉丘老師的同學，都知道他曾經參加過本港的一些遊行示威。他認爲這沒有什麼不妥，這是現代人發表意見的自然方式，加上他曾在美國居住十多年，覺得這只是很普通的事情。

那麼，他有沒有支持某些政治團體呢？他答道他是不會支持任何一個政治團體的；他只是從不同的政策或事情去進行具體分析並提出主張。而一個政治團體在不同的事情和政策上都有可能有錯；盲目支持，對錯都照單全收，不是負責的態度。

六四事件後，很多民運人士逃往海外，而丘老師曾和他們接觸，那麼丘老師對他們又有什麼評價呢？丘老師認爲他們在民主生活的實踐上仍然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畢竟，他們不是從民主社會出來。就算他們客觀地想去搞民主，但用的大都是一些極不民主的方式。例如他們想組織一個統一團體，這是丘老師所不贊同的，因爲不可以用一黨專政的方式去對抗另一個一黨專政。我們一定要和獨裁專制劃清界線，透過一個和它在方式或任何其他方面都不一樣的民主實踐去對抗。另一方面，中國的民運眞是沒有什麼基礎，從人民到知識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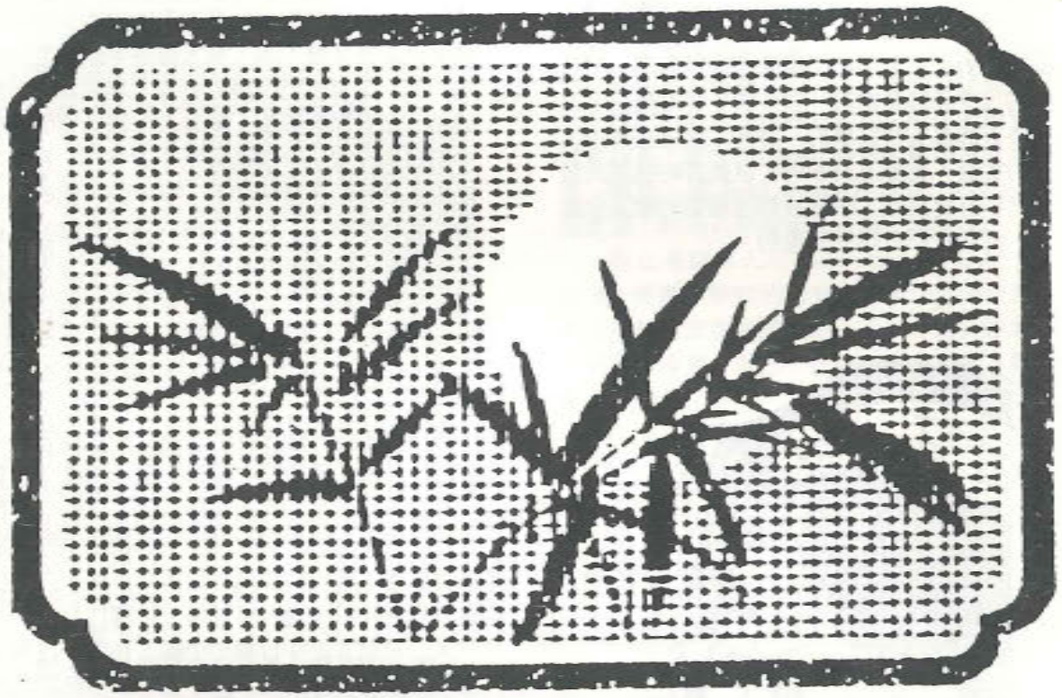
都缺乏對民主生活的認識和體驗。實際上，中國的民主運動是處於一個非常年青的階段，有很多方面都有待發展的。香港人對這些民運人士的批評，實際上是好的，但批評時應該比較中肯和有建設性，因爲他們所面對的壓迫和敵人，都是我們所沒法想像的。

對中國研究的看法

最後，我們想請教丘老師對中國研究同學的印象。丘老師指出他是不會把學生分類的。如果硬說有什麼不同，那大概是中國研究的同學們不太清楚他們所讀的東西，故表現得比較被動，沒有那麼積極。事實上，從求知的過程中看根本沒有「中國社會學」這一科，我們只能用社會學的多種角度去了解中國。例如「中國的社會控制」一科，爲何只研究中國的社會控制？社會控制有其普遍性，我們是否先應該學習社會控制的普遍概念，或者用一個比較研究的角度研究中國的社會控制？因爲缺乏其他國家的比較，我們很難看出中國社會控制的特殊性。

中國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它是世界的一部份。只看中國便是太過以中國爲中心了。進一步說，中國也只不過是亞洲的一部份；假如研究中國不也研究中國和亞洲的關係，那問題就大了。中國人的亞洲意識非常薄弱，自從西化論流行後，中國人已忽略了中國作爲亞洲的一員；包括香港和台灣的中國人在內，沒有不盡力忘記自己是亞洲人的，丘老師感到這些都是不對的。

校園生活



主席隨筆

中國研究學會第一屆幹事會中研閣主席梁韋洛

一年前，一百零八個好漢雲集在聯福道校舍，他們當中雖然許多都互不相識，摸不清對方的大名，但要緊的是，他們全都抱着同一目標，就是爲爭取他們在學院裏的獨立地位而努力，因爲他們深信自己是屬於中國研究的。

在這萬衆一心的前題下，各好漢放下了一時衝動的成見，並排除了許多想不到的困難，正式成立起中國研究學會了。

驀然回首，這段日子雖然是艱苦與漫長，但令人振奮的是所有一百零八個同學都曾付出了他們對學會成立歷程的一番熱誠。可以說，沒有了他們的衆志和努力，就沒有中國研究，而中國研究這幼苗，也在他們的悉心照顧下茁莊成長起來。

九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國研究學會終於在學生事務處正式註冊了，第一屆幹事會也同時開始運作。

當上第一屆幹事會主席所遇上的問題與困難可眞不少。第一是本身內閣成員的聯繫問題。由於幹事會是必須由四個專業的同學組成的，不幸的是第一年的隔膜令許多中研同學都互不相識，而我們的幹事會也不例外，故此我們在開始的時候，甚至連對方的名字也常記不清，更何況在工作的聯繫上。可喜的是這情況很快便因我們的主動接觸而消滅了。

另一個最大的問題便是最實際的金錢問題了。學會成立之前，雖曾向每一位同學收取十元作臨時的行政費，但其實這筆錢已差不多全用在影印會章和其他瑣碎的影印和行政上，連一毛錢在當時也是沒有留給幹事會的。問題也因而來臨。在十月向各會員收取基金與會費之前，幹事會已需進行迎新營、夏季會衣和會紙等的籌備，而這些活動與訂購，則必須有充裕的資金以應付；迎新營需要五佰元作臨時費用，夏季會衣需要二仟多元作購買，而會紙更需三仟多元以訂購。面對這樣大的困難，你會如何做呢？我們幹事會曾想過透過電話聯絡通知各同學先交下學年的八十元基金和會費，但想深一層，這是不大可能的。最後，我們只好先籌集十三位幹事每人八十元的基金和會費，然後再向某幾位同學各商借數佰元以暫解燃眉之急，至於會紙的訂購則一拖再拖，直至十月中才繳付。雨過天晴的今天，容我再一次多謝當日曾給予緩手的友好同學：陳永德、李書敏、李惠嫈和張國樑。

一年來的幹事會工作，得到幹事們的合作和其他同學的協助，總算不過不失。不過，你又可曾想過他們流了多少的血與汗。十一月尾的書展與論文展覽期間，我們的福利幹事麥榮康因工作過勞而出現了流鼻血不止的情況，需要入院治療；購買冬季會衣的時候，我的同學陳永德與我在尖沙咀和旺角徘徊了四個多小時，直至晚上八時許才各自離去，爲的是那七十九件會衣需在不同的店舖購買，而當日正是他與女朋友慶祝生日的好日子呢！

常聽到一年級的同學訴說，點解又唔搵電影籌款、舞會等節目，來來去去都係步行籌款、聖誕聯歡晚會和辯論比賽等他們無興趣的活動。說眞的，有時我聽了這些話眞是很傷心，傷心原因不是因爲我們所舉辦的活動得不到他們的支持，而是傷心他們不明瞭前輩們爲他們建立溫室時的衆志齊心。

二年級的同學們雖然在以前並沒有我是屬於中國研究的觀念，而只有我是屬於經濟學、地理學、歷史學或社會學的中國研究觀念，但他們在成立了中國研究學會之後，卻都完全投入地支持學會所舉辦的許多活動，故此學會的一切他們都着意關注，幹事們在上堂宣傳時他們都靜心聆聽，甚或鼓掌支持，到了活動進行時，他們又往往是最支持的一羣。我想這是因爲他們曾參與學會成立的長征罷，故他們十分珍視現在與其他中研同學和與中研學會的關係。但反觀一年級的同學，他們一進來就讀時就知道自己是中國研究這學會的一份子，他們相信這是他們必須的和必然得到的。在這無奈的環境下，一部分的同學對本會的投入感頓失，甚至我們的幹事在他們的堂上宣傳時，他們亦不會留心亦不想知道本會的動態，至於活動時的參與人數就可想而知了。這是令人痛心疾首的。

伏案在前，思憶一年來的一切，不禁百感交集。我不敢說第一屆幹事會爲你們做過甚麼，但我深信在過往的一年基礎上，中國研究在未來的發展歲月裏，如果能再結合大家的凝聚力，前途是光明的。

最後，我想在此用一些格子，再次多謝第一屆幹事們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外副謝盛昌的大方得體，福利麥榮康的謹愼持重，學術黎耀强的默默耕耘和宣傳李惠霞的任勞任怨。衷心再一次感謝！

回顧過去　展望將來

中國研究學會第二屆幹事會衍華閣主席
楊少潤

有人說：九十年代，是一個承擔的年代！而我們身爲大專生，更加應該坐言起行，積極參與活動，投入社會，關心身邊發生的事物，盡量擴闊自己的眼界，不斷地充實自己。只有這樣，我們才有能力去承擔及應付未來的轉變和挑戰。

一年的大專生活已接近尾聲，回顧過去一年，不是忙著趕 papers，就是忙著應付導修和考試。無疑，讀書固然重要，但難度我們只甘心做一隻「蛀書蟲」嗎？我相信人生的目標並不是單單爲了讀書，除了讀書之外，我們身邊還有很多事物值得我們去做的。這亦是我決定參與中國研究學會的主要原因。

當我知道衍華閣被選爲來屆幹事會時，內心又喜又憂。開心的是我們的熱誠和計劃能夠得到大部份同學的支持和接受；憂慮的就是如何才可以令到各級同學都滿意我們的工作表現。相信大家都知道，承擔起學會的工作，並不是一份優差，各幹事都要付出不少的私人時間和精力，更可能會吃力不討好，但這並不要緊，因爲我們在組織衍華閣時，已經作好了心理準備，而最要緊的是希望我們這番熱誠不會枉費。

我們最期望的，就是各位中研的同學可以齊心協力，團結一致，積極參與活動，齊齊搞好中研的學習氣氛和學術地位，加强各同學的凝聚力及歸屬感，使中研不但可以在浸會這個小小的校園裏有一席位，甚至在社會上也可以得到各界人士的重視，這就是我們參與學會事務的最終目標。當然，要達到這個目標，並非一朝一夕的事，也並非單憑我們十數位幹事的力量就可以做到的，而是要依賴各位同學不斷的支持和參與才會有機會達成的。所以，希望各位同學可以積極參與學會的一切活動，加入附屬幹事行列，共同策劃學會事務，同步向前！

回顧過去，無論成功與否，都無法改變；展望將來，也只不過是一種幻象而已。因此，我認爲最重要的還是要把握現在！希望各位同學可以好好珍惜這短短三年的大專生活，積極參與活動，做個九十年代的大專生！

LONG MARCH TO "CHINA STUDIES SOCIETY"

Kwan Kei-Ieung (Soc Ⅱ)

Amidst my hurrying steps near the Art So. counter, a shadow dashed past. It's Mr. Lai, the Academic Officer, who was crying for a short passage from me of the "Facts and Feelings" starting from the seeding till the final establishing of the China Studies Society. Perhaps the few guidelines given me rendered large flexibility in fulfilling this job. But one thing is: many events were not appropriate for airing; while another is: routine facts would make the passage a dry summary of meeting minutes.

With this in mind, I started to stir up the stream of memory of those past days somewhat repressed in the Freudian sense and interlocked between the feelings of hope and misery, of vigour and exhaustion, of solidarity and solitude.....

The very first lecture in the history of " China Studies " was about to begin; the lecturer had not come yet. The course-mates were in and out, to and fro, up and down. Among them, some were individualistic; some cohered within the option-boundary; some were brave enough to break through the inter-option gap, but with high probability these would be labelled `deviants'. The problem was that all had been undergoing orientation under the flags of their respective options, so they were apt to identify themselves more with their options than with their course. (Test: imagine your reply when enquired about what you study.)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initiative to establish a course society was weak and originated from a few students only.

The first step to be taken was to have these pioneers meet together for the sake of reaching consensus. Then followed the next step that a vote be taken within such option to decide whether to back up the proposal. The third step was to petition the Student Affairs Office.

One option was slow in their response, but when it finally nodded support, the green light was on.

It's naive to think of the process which followed as a finishing end that commanded the welcome clappings of all parties, like the Liberation Army saluting into Beijing forty years ago. Rather, if the communist analogy is insisted upon, it marked the start of the weary one-hundred-and-eight-thousand mile Long March, wherein one obstacle overcome paved the way for a harder one. As a result, one by one, the high-spirited pioneers faded out of the scene,

to be replaced by ones with lower and lower spirits, and in the end without replacement at all.

The task then to follow was to petition the S.A.O. Perhaps puzzled by the peculiar and unprecedented composition of our `Course' society, the initial support from the S.A.O. was a passive one. Most teaching staff acquiesced throughout, but perhaps owing to our neglect of explaining the nature of the proposed society, at times we could hardly resist the feelings of discouragement. Anyway, thanks to the much-admired democratic enthusiasm of both, the momentum was left to us to accelerate.

But -- now in the middle of the second semester -- we were on the verge of the deadline, mid-May the latest, before which we must submit the year-plan if we were to gain subsidy in the following year. And the pre-condition of the submission was: the election of the first Executive Committee, which in turn presuppos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So, allowing no delay, we located the only one hour in each week during which all option representatives could sit together, with the lateness of some representatives cutting the hour into halves, during the remainder of which we re-argued whatever issues necessitated by the previous absence of the now-present representatives.

The discussion therein was always difficult. The dilemma was that we could not appear to dominate the meetings at sacrifice of others: after all, all options were equal. One way out was that we took turn of chairing meetings, but this proved at best not advantageous, in that each person's chairing style was different. In short, we proceeded like snails along the clauses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back-counting towards the examination began. In the library, some course-mates were busy xeroxing notes and texts; in the canteen, others were sticking to their routine of exchanging rumours. But we had no time out, imprisoned within the mental cell entitled `Constitution'.

No sooner had the Constitution had its contours than we alerted any parties interested in forming a Cabinet. Before long we had one. Alas, a problem surfaced! We could permit no risk of its being vote down, for no time would be available for another before the deadline.

Many sleepless nights passed. If there had been a dream, it must have been one about a political story, in which I was suddenly an observer, suddenly a participant. The line between reason and emotion had often been dim; and in the story, emotion took command.

Now, a few days away from the examination, the prospect of having an election meeting with sufficient attendance fell to nil. The birth of the first Executive Committee this year was deemed abortive. Then, upon our request, the Student Affairs Office gave us a grace period extending after the examination to accommodate our difficulty.

The work after the examination was comparatively easy. Many Organising Committee members then became the members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After the submis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approval document from the S.A.O. was forthcoming. And it arrived, through many hands and with much delay, at me on the day of election ------ and contained a one-year Probation Clause, which implied that within one year, the now-named `China Studies Society' was liable to involuntary dissolution. The Clause aroused much concern. In the Election Meeting, representing the Organising Committee, I was vigorously questioned about the reasonableness of such Clause. I declined any invitation to premature overt judgment, in return for the charge of bias.

On the same day, the first Executive Committee was born together with the chairman of the first Representative Committee.

中國人—中研人—中國人

謝盛昌（歷史二）

我在百萬人的呼喊聲中前進，但往那裏去呢？路兩旁傳來的掌聲，是在給我啟示嗎？我們同樣是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的四十多年來在彼岸默默發展，我們會再攜手前進嗎？

中學時代這一連串的問題湧上心頭，數年裏被困惑得不知如何是好。常常自問這個就是你的國家嗎？鄰家有位廿年的好朋友常常讚嘆花旗國的强大、先進。還記得孩童時被他的先進花旗玩具吸引、傾倒。我軍常常被他打得落花流水、落慌而逃。儘管他的玩具隨着歲月的遷移而有所改變，變得尖端、變得多元化。然而我以前的那份無奈，開始被激化了。現在他已處身楓葉樹下向南遠眺他的星條旗了。在殖民地下成長的一代，究竟何處是吾家呢？

你可曾想過你是五年前一羣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的、在西安聚集在我吃剩下來半碗麵的「同胞」呢？兩年前你可曾說過、唱過「我是中國人」呢？你又有否感受到在電視螢幕上兩岸同胞重聚一刻的悲痛感覺呢？

我不是提倡什麼「大中國主義」、「沙文主義」或「中原文化本位主義」等，而是覺得新的一代對我們祖國感性的認識漸漸枯歇。慶幸我仍感覺到中研二年級同學那股「中國感」、「民族認同感」。無論您在何種情況下加入中研；由衷的或無選擇下的，您在這裏所面對的，被期望的都與您心目中的「中國」不可分割，無論您是渴望認識中國而來或是只求取得社會科學（榮譽）學位，我們仍是要拿出我們的感性認識及中國情操來，因爲我們是唯一以研究中國爲主的大學生，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中國人。

盼望我們中國研究的每一員能學以致用，爲統一、發展中國獻出一分努力，共勉之。

中國研究課程的問題

林權（歷史一）

香港一向缺少專門研究中國的學士課程，故當知道浸會學院創立了中國研究學科，我十分高興，並滿懷希望，報讀了這科。

現在第一學年快結束，我卻十分失望，因爲課程的設計頗多問題，使同學未能充份善用這學習機會來研究中國。

第一年的課程，問題最多；而其中以四個專業基礎科目的問題最大。當初我們報讀中研時，需要選擇修讀一個專業，目的是希望同學能集中研究中國某方面的問題，而多數同學當然會選擇自己有興趣及有能力應付的專業。

但同學除了自己專業的基礎科目外，還要兼讀另外三個專業的基本科目，這樣問題就多了：

㈠不考慮各專業同學的基礎，在預科甚至會考沒有讀過的科目，而現在要讀的話，很難從頭趕上。

㈡爲顧及其他專業程度較低的同學，內容不能更深入，故較有基礎的同學的程度，不能進一步提高，很多人有重讀預科之感。

㈢其他專業的基礎科目，對修讀自己的專業沒大幫助，反而浪費了研習自己專業的時間。

舉例來說，假如我專讀地理的，讀史學方法，對我幫助不大。又如果我在中學沒有讀經濟，怎可在一年內，明白比兩年預科程度更高的經濟理論呢？

雖然下年要讀其他專業的三個科目，但爲了讀這三科，是否值得花一年的時間，讀三個非自己專業的基本科目呢？

可見，這種安排實在有輕重不分，本末倒置之弊！

此外，語文科目亦有問題。普通話對研究中國有很大幫助，但這科卻編在第二年上學期。只有少於半年時間學習，而很快就要上北京。大部份不太懂普通話的同學，恐怕很難應付吧！

故此，希望校方能盡快解決這些問題，增加我們主修專業的基礎知識及訓練，並減輕其他專業科目的壓力。

而我建議各專業可開設一種簡單的基礎科目，供非此專業的同學修讀，內容應力求配合第二年有關的科目。同時，可爲各專業的同學開設更詳細深入的基礎科目；這樣，既可鞏固同學自己專業的根基，又可減輕兼讀其他專業的負擔。

而爲使同學能盡早練習普通話，可於第一年開辦此科目，並改爲上下學期的學科，延長學習時間。

以上是我個人對本課程的意見，希望能作爲校方的參考。更希望師生雙方能多些接觸，交換意見，使這學科能盡善盡美。

消費者是理性嗎？

足球小將（經濟二）

在經濟學上，尤以微觀經濟學，有一個重要的假設，就是「消費者是一個經濟人」（ECONOMIC MAN），或另一說法，是「消費者是理性」的（RATIONAL），其意義就是說一個人在消費時會將其消費滿足感優化（UTILITY MAXIMIZE）。每個人都是主觀動物，而其滿足感亦以主觀內在因素決定，故同一樣物件亦可給與不同消費者不同滿足感，在理念上，這一個觀念可說是無可反駁，有所謂「子非魚，焉知魚之樂」。在財政司宣佈財政預算之前，我深信不疑。

不過，自九一年三月一日之後，我開始對這個微觀經濟學上的重要假設的可信性開始起疑心。自財政司宣佈煙草稅增加一倍後，原來十二元至十三元的香煙在一夜間價格漲升至二十二元。一日要以一包煙爲生的煙民，現在一個月要增加三百元開支，如果這些煙民對香煙的價格需求彈性爲零的話，香港來年的國民消費總值肯定有突破性增長，而政府的稅收（煙草稅）亦會相應增加。

然而，令我開始懷疑「消費者是理性」的假設並不是煙民的消費行爲，而是我的同學。衆所周知，在深圳過關買煙有免稅優惠，其差價大約（在加稅前）五元；但加稅後，其差價就差不多十二元（免稅煙亦增價至十元）。每人過關可携帶五包香煙過關，每次出入便可取利五十元，這做成了我的同學開始發展出一個回國買書風，他們認爲來回火車票只售四十二元，一來一回還有八元利潤，故便一羣人等浩浩蕩蕩操回深圳，希望可尋得一些合用的國內版書籍，不過眞令我不相信，我們四個同學竟合共買了價值六百多元的書，總數量大約八十本左右；不過我還不算什麼，有的同學竟然「好馬要吃回頭草」，第二次北上，今次還利害，每人竟買了大約四十本書。

所以，我不得不懷疑他們是否一個理性消費者，當我問他們是否眞正需要現在購買這麼多書，他們（包括我在內）却認爲國內外的差價實在太利害；在香港買一本同樣的國內版書籍，其價格大約是國內價格的三至四倍，在心理上，做成了「放在書架作展覽都值」的觀念。據不正統的訪問，有不少同學覺得自己是不理性，所以我有一個提議，就是以後開始研究一下不理性微觀經濟，大家可能會有一條新思路。不過這只是一個空想而矣，無論如何，多些思考對個人發展總是有益。

中研基督徒生活

JOHNSON（歷史一）

說起中研一年級的細胞小組之成立，就一定要提及九〇迎新營了。

在入營那天，我心有點難受，因爲知道迎新營是有出席的必要，但是對着一班素未謀面的人，眞是有點害怕。最後還是硬着頭皮地出席。

當時我組其中一位輔導員，那就是狀似孔武有力的 RAMBO ，他向我們問了一個問題：「你們哪一位是基督徒呢？」頓時使我想起，這三年的大專生活並不是孤獨地走，而是有一班主內的弟兄姊妹伴我前行，這是令我感到鼓舞的。

當天晚上，中研的基督徒有個分享的聚會，大家彼此介紹認識，這樣便開始了中研一年的細胞小組。

以下便是細胞小組其中的一位弟兄—死嚟仔—對細胞小組的感受：

我是「死嚟仔」，不是「靚仔」。「死嚟仔」有兩個特質：一是唔識死，有碗話碗，有碟話碟；二是童心未泯，外表非常世故，內裏卻仍保持對完美的追求、對眞理的憧憬，信不信由你。

基於以上「死嚟仔」的兩種特質，我會抒發自己對中研基督徒（一年級）的感受，當然是指我們的細胞小組（Cell Group）內的基督徒吧！

對於這個細胞小組，我是非常看重的。除了細胞小組外，自己也有加入基督徒詩班及在教會侍奉。但相比之下，我會毫不考慮地說我最享受細胞小組的生活，不單因爲大家都是屬於中研，話題較多；而是與組內的弟兄姊妹非常投契，那種合拍的程度，比之我與詩班及教會的弟兄姊妹相比，有過之無不及。尤以每次開組我都希望時光能慢一點上可見一班。或者對我來說，每星期個多小時之相聚，實在太少了。

感謝神，在以往的生活中，我的好友往往不是基督徒。但自入浸會，情況便好轉了。現在我身邊的好友，也是細胞小組的組員，令我不單在信仰上有所分享，在日常生活上也有所分擔。

在小組中，各人皆有各人的特點及長處，男的不乏英俊而瀟灑、博學而多才、細心而幽默、忠厚而老實、精明而能幹之輩。至於女的更是國色天香者有之、嬌俏可人者有之、溫婉含蓄者有之、聰明才智者有之。衆姊妹眞是天生麗質難自棄……而他們更有一顆愛主愛人之心，能在世上發鹽發光。

想起基督徒在世上作鹽作光，便想起我們一班弟兄姊妹不是自閉一族的成員。大家都分別按着個人的興趣去參予不同的小組。如國事學會、辯論隊、詩班、團契、攝影學會、柔道會及查經班等等。最難得的是當中更有着弟兄姊妹，經常在校園內外作個人佈道，傳揚天國的福音，其他弟兄姊妹更在各自教會內積極侍奉，榮神益人。

諸君看至此處，多說本人只褒不貶，未免有點兒歪曲事實，尤以形容小組之弟兄的特點及長處爲甚。當然，小組仍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眼看自第二學期後，衆弟兄姊妹也熟落不少了。大家彼此關心、彼此扶持之心，往往會在日常生活中流露出來。故縱有缺點，大家也能互相體諒。而我與細胞小組的關係，就好像情侶一般。既然視小組爲情侶，它的缺點也變成了優點了。

最後我想說明一點，細胞小組的作用，是讓弟兄姊妹有彼此分享及關懷、一同在基督裏支持力量的作用。若神不在我們中間，這個小組只可稱爲一班基督徒一齊飲飲食食的組織吧！若神是喜悅我們的細胞小組，就願這個小組繼續下去。弟兄姊妹們，一齊努力吧！

微弱的聲者

張少强（社會一）

本校所新開辦的中國研究課程，至今已有兩年的時間；亦是時候作出檢討，以求達到更佳的效果，步往更好的境界。

觀乎中國研究課程之設計，委實是極具高度綜合性的；故其內容共分爲四，即：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四項。其目的當然是希望同學能對此四項學科，有相當程度之認識，繼而專精其一；因而於學習上，具備多方面、多角度之分析能力，務求做到跨越學科的全盤觀察精神，此正爲其可觀可取，可赫然成一課程之處。

要言之，中國研究課程之優點，是在乎其全面而又廣博的爲學方針，好讓修讀者能廣泛地洞察中國的國情。奈何此課程，雖得之於廣博、全面，然其所失，亦在於此。

誠然，同學如能眞的結合四科之精髓，會通四科之長處，無疑是十分理想的事。可是，現實的情況，却是差强人意。同學往往是感到課程，迂闊無憑，渺無涯岸，乃至於出現了適從無所，難以掌握的問題。亦因此，使同學對於各科之理解，每每是一點粗淺的認識，一堆含糊的概念；大有不湯不水，不知所歸的敝病。如若與課程設計之理想相比，其間所相距者，甚遠。

究其問題之根本，則在於各科之教授，各自成一體，而科與科之間，如何聯系，如何一起運用，則無從知曉。於此毫不隱諱而言，此學系之課程設計，確有眼高手低之嫌。

又復同學的學養背境，頗爲參差。如以經濟學爲例，同學的學養水平，已達至預科者有之，僅達至會考者有之，下於會考者也有之。是故，就學養水平較高者言，仍能對課堂所講所授，有所措手之餘地；但就學養較低者言，則難以追上課堂上所教授的程度。復以講授的內容，又非一般基本的經濟知識，至使問題一發而不可收，倍加嚴重。（這裏以經濟學爲例，並不代表其他學科無相類之問題，而只是爲了方便討論，才舉此一例）。

還要關注的是個別學科的課程內容，於設計上，有其不公平之處。此情況尤以地理學爲最。地理學之課程內容（以第一學年言，幾乎與預科之課程無異。是使曾修讀預科地理學的同學，對於考試，功課等，莫不駕輕就熟，易如反掌，毫不費力地便可得到較優的成績。但對於未曾修讀預科地理學的同學來講，則感課堂所授，艱深難明；而於考試、功課上，則仿如重擔千斤，吃力而不討好。爲其不公平地方之所在。

倘若，這些問題，不趕快地加以一一改善，則不單使同學失去學習興趣；久而久之，更會影響同學之歸屬感。因此，如欲達至課程設計之目的，如欲解決同學現有的問題——改善課程，是一刻不容緩的大前題。

上述所言，雖非經正式調查所得，但亦是筆者與同學平日論及課程時，所得的意見；縱是如此微弱的聲音，仍盼望校方能加以深入探討。

社會主義迷信

彩雲（社會二）

某講師 Dr.Chen 給人的印象好像好有「料」，他以研究中國經濟的發展問題爲主，向來强調中國經濟發展的路向是有自己的特殊歷史因素，有自己的各種客觀環境制約，所以不能夠生搬硬套西方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新古典學派）的模式（Model）去分析及指導中國的發展。幾年以來他和另一位經濟學的大師級人馬（在香港來講）的論戰一直都有一羣忠實的支持者。

香港近數十年來是依靠自由貿易起家的，又由於受西方傳播媒介的影響，因此敗成新一代的人都有資本主義迷信的傾向：總之資本主義就係好嘢，東德、中國、北韓、越南等走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團糟，所以社會主義係邪惡嘅、害人嘅！Dr.Chen 從學術的角度理解中國社會主義的 Rationale，固然打破香港人的迷信，但是他本人的立場亦變得越來越親中，言論中越來越有偏激的一面。在城市論壇上，他讚成中方介入干預興建新機場。Dr.Chen 指出新機場計劃是英國政府搶錢的陰謀，更用到殖民地政府等字眼，Label 英方的不義，鞏固自己的觀點。但是他有沒有想過「前門趕狼，後門進虎」呢？就算我們知道英國人係搶錢，難道我們就要投靠中方？大陸人又何常不當我們是肥豬肉。在 Dr.Chen 眼中，中方固然有他們的 Rationale，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亦有他們的黑暗面，但是 Dr.Chen 似乎高估了中共 Rationale 的成份。我們香港人面臨一個大轉變，我們生活在一個多主義的社會中，我們要學習用北京人的角度理解香港的事務，亦要認清楚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流弊，我們更加有責任維護香港的自治，防範中國的越軌行爲，「河水不要犯井水」！

六句說話

基斯杜化李夫（經濟二）

「共產黨想做的事情，是沒有做不到的。」
「只要政治掛帥，就無往而不勝。」
「新中國不會餓死人。」
「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造成的。」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
「知識越多越反動。」

回顧家國四十年，上帝之城遙不可及，撒旦之獄卻清晰在目。如說到烏托邦的話，不是惹得人聲淚俱下，雞犬爭笑，基督沉默嗎！

伏案寫稿，執筆凝思，不覺夜已深，抬頭往窗外探望。唉！又是下雨天！

學術版

凱因斯經濟學派及凱因斯其人

張國樑（經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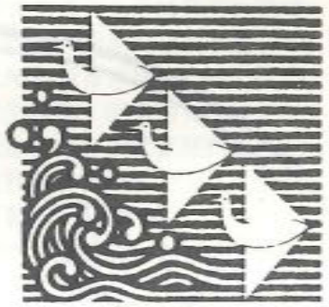
正如有人戲稱凱因斯經濟學爲「不景氣經濟學」一般，此一學派以一九三〇年世界性不景氣爲其背景。一九二九年秋，以美國紐約股票交易所大暴跌爲發端，數千萬名的失業者充塞整個地球，大半數的工廠停止生產，史無前例的不景氣席捲整個世界。

無論如何，必須避免此種資本主義體制的危機，因爲在暗地裏蓄積實力的共產主義勢力正期盼此種崩潰的降臨，世界經濟開始恐慌的一九二九年，蘇聯實施第一次五年計劃。社會主義國家未發生恐慌，隨着工業化的急速進展，在不知不覺間此種新社會體制已成爲資本主義的强悍競爭對手，可是不惜殘酷犧牲的共產主義政策，不足供作對抗的手段。

由之，在力求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之餘，務必另行追求修正其缺點的有效新理論。一九三六年以《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爲代表作的凱因斯理論，便是其典型表徵。

什麼是此理論的根本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將打開景氣的方策求之於貨幣需求的增加。從而，「消費即美德」的經濟理念，取代史密斯「節約即美德」的理念而形成一種時代思潮。在史密斯的時代，資本家仍是小規模的生產者，因此他認爲藉節約以積累資本，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泉源，節約不僅對資本家個人，而且更對整體社會來說，是一種美德。然而，當小規模的產業資本家成長爲巨大的獨佔產業資本時，節約不但使需求減少，更產生過剩的生產能力。在不是生產不足而是生產過剩成爲貧困的原因的社會，節約已非一種美德。從此種觀點，凱因斯提出了決定社會雇用量（就業量）的是需求的大小——以有效需求的原理爲基軸的經濟理論，主張政府藉金融財政的需求刺激政策，作爲克服危機的主要方策。

因此，凱因斯的經濟學實係深刻不景氣下的產物，是具有供作實際政策性格的理論；從而就國家權力而言，仍保持着一種不同於古典學派的態度。



古典資本主義理念的信條，是植根於徹底排除國家權力干涉的企業家間的自由競爭。但是凱因斯的意圖則在使國家權力和產業資本癒合，凱因斯理論和政策之所以被稱爲國家資本主義的理由也在此。在此種國家主義風潮的基礎上，容許企圖融合資本和勞動大衆間利害關係的厚生經濟思想存在。

從以上的簡短描述，相信同學對凱因斯學派已有一定認識了。現在我再談凱因斯其人。

凱因斯生於一八八三年，於一九四六年逝世。有人說他是位卓越且多才多藝的英國人；他既是現代藝術的先鋒收集者，又是經濟學家；他既是編輯，又是出版人；他既是總統的顧問，又是金融投機者。看來，凱因斯眞像萬能俠，無所不能。

凱因斯進劍橋時，是學數學的。他的第一本著作就是《或然率理》。可是他的兩位經濟學老師，硬說凱因斯是經濟學的人才，把他從畢業後當了兩年公務員的倫敦生活中拉回劍橋，由老師自掏腰包給他一年一百鎊的獎助金，把他留在劍橋，讓他深攻經濟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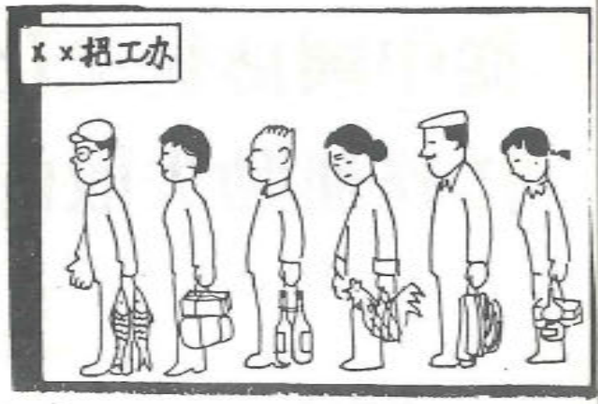
凱因斯不單擁有驚世的學術才華，他的人格與勇氣更是閃鑠今古的。

第一次歐戰告終，巴黎和會時，凱因斯當英國代表團的經濟顧問。他看到協約國方面擠

兌德國所作那些不可能達到的賠償條約，中途辭職不幹了。古語有云：「以道侍君，不可則止。」凱因斯憑着他的屹立獨行的勇氣體現了這句說話；從這句說話又可知道他仰天無愧的人格。凱因斯回英以後，寫了一本書，評論戰勝國對德國苛刻條款之不切實際，除了把德國逼瘋外，不會收到任何效果。然而，各國的政要卻把他說話當作耳邊風。世人總以酒醉的爲多數，清醒的，又有幾人呢！凱因斯的話不幸而言中，而且那種失去以理性爲基礎的賠償條約還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因素。那時的凱因斯還不足四十歲。他說：「美國的威爾遜總統是既聾又瞎的古訶德先生；而威爾遜的思想多是基於神學，而非知識。」

凱因斯對馬克思及其信徒並沒有好感，且聽他對他們的批評：「我怎麼能夠接受一種教條，像本聖經似的，高高在上，不許批評！我怎麼能夠接受一個過了時，落了伍的經濟教科書，那上面不僅科學上的錯誤，比比皆是；而且對近代世界根本應用不上，我怎能夠接受寧要泥沙，不要魚，把粗野的勞動階級提到知識階級之上。即使是說知識階級有許多錯誤罷，但它終究是所有人類進步的播種人。又有人說了：我們需要一個宗教，但，我們在那紅色書店的狂熱垃圾中會能找到宗教？一個受過教育的，有點高尚情操的，有點知識程度的西歐人，到那裏去發現理想是太難太難了。……」

「我批評它，並不是爲別的；只是因它對世界上究竟眞正所發生的並沒有抓到要領；我批評它，是因爲它是這麼一個塵封多年的藍圖，用一百年前一個人所說的話去解決五十年前社會上所發生的問題。」



必要手續　　王永年

凱因斯所說的雖有點過火，但還有其可取的地方。將紅色書店中的書籍統統都說成「狂熱垃圾」未免有些失實與刻薄；然而，馬克思的理論的確是「一個塵封多年的藍圖」。如果不加反省與修正，將它直接運用，解決現在的問題，那麼連最愚蠢的人，都會感到可笑！

當今的紅太陽國家，在使用馬克思理論的時候，大都作了修正，與時代並進，所以有中國式社會主義出現。凱因斯之所以批評馬克斯理論，都是基於人類生活的幸福。我想，所有經濟學家都要以此爲依歸，不可爲某政權，某政府的利益而工作，情形就如凱因斯中途辭去英國代表團經濟顧問一職一樣。

凱因斯懷有一夥溫暖的心，憑藉此心，他竭力爲人類追尋幸福快樂的生活。而上天又賜與他冷靜的頭腦，以此頭腦，他的溫暖心更覺溫暖。

我們的中國能否出現一個這樣的人呢？此時，中國的教育和其他問題自心中湧起。關於教育，人人都說是毛鄧的錯，說他們只攪什麼思想教育，禍害了中國。細心思考，其實問題非自他們始。多少年來，中國都被魔鬼纏身，揮之不去，擺脫不了。魔鬼是什麼？是以生也有涯，知也無涯的慨歎，來掩飾自己的懶惰；是以天地逆旅，百代過客的詮釋，來解嘲自己的苟安。是以淡泊明志作爲學優則仕的準備，是以滔滔皆是，作爲自甘沉淪的遁辭。如此種種無助於中國的貧弱，更無助於中國的現代化。

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

問題如一波一波的浪花；思想如一片一片的潮水……

二十世紀行將結束，冀望二十一世紀來臨之日，便是中國從惡夢中甦醒之時。

從中國傳統文化看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及其意義

鍾謙（地理二）

一、引言：

步入十九世紀，東西關係起了巨大的變化。西方國家挾工業革命的成果，遠渡重洋，試圖打開封閉的中國市場。然而，基於雙方文化背景、價值觀念等的不同，以致產生連串衝突，最後以兵戎相見。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之役的失敗，一方面令中國了解到西方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進步，另一方面又對西方的船堅炮利感到無比的憂慮。終於在咸豐十年十二月（一八六一年一月）恭親王奕訢（1833-1898）聯同大學士桂良（1785-1862），戶部左侍郎文祥（1818-1876）上奏，提出六項章程：1.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責外事。2.南北口岸分設通商大臣。3.新添各口關稅。4.各省督撫協同辦理外事。5.設館授外國語言文字。6.按月收集各國新聞紙。（註1）其後又再次上奏，力陳「採源之策，在於自強，自強之術，必先練兵。」（註2）可見在清政府內部，一股強烈求變，要求學習西方的思想已經分化開來。其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同文館先後在京成立，其他各項建議也相繼實行，一時引起極大的連鎖反應，地方大吏紛紛上奏，各陳主張，維新運動之樞機啟矣。

表面看來，這場以「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爲號召，學習西方軍事爲主的洋務運動（或自強運動）皆有一定程度之可觀性，亦爲當時的清政府帶來一番新的氣象。惟經過三十多年自強變革之清朝，先後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及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於中法戰爭和甲午戰爭中，慘敗於法國及新興島國日本之手。數十年艱苦經營的成果，毀於一旦。自強不成反而國勢日殆，這場自強維新運動，亦可謂一敗塗地矣！

洋務運動雖然失敗了，但作爲中國近代改革運動的濫觴，自有其一定之研究價值。而歷來的學者，亦均於政治結構，經濟狀況，文化背景等方面對它的失敗原因作出了詳細的分析。現在，這篇論文亦嘗試從傳統文化這方面，對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作一粗略的探討。更嘗試探討是次自強運動失敗背後的文化意義：中西兩種文化在「價值系統」（Value System）上不同之處，進而提出「中體」能否「西用」的問題。

二、洋務運動與傳統文化的關係

就歷史而言，中國文化發軔於商周，而成於秦漢。以孔孟之道爲中心的儒學，以仁、義、禮、孝、中庸、忠恕等禮治秩序的觀念，把政治，社會和家庭緊密的結合起來。下及清朝，這種經過二千多年實踐的文化，已經根深蒂固，形成一種牢不可破的傳統觀念，對中國人的處世行事起了十分大的影響。關於洋務運動與傳統文化彼此間的關係，可以分正反兩方面來看。

首先就正面來說，洋務運動的發生，是中國傳統中「知行合一」、「經世致用」思想的表現。洋務運動之策劃者如恭親王奕訢、文祥、以致後來的曾國藩（1811-1872）、李鴻章（1823-1901）、左宗棠（1812-1885）等，均力主向西方學習，這個主張的提出，並不是偶然的，而是當時中國面對西方文化侵入所帶來的社會變化時，中國知識份子思想上的反映。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鴉片戰爭爆發，西方的工業文明，挾雷霆萬鈞之勢，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其後的一連串對外戰爭的失敗，使一部份士人迷夢初醒，才知有世界，有列強。對西方之文明和武器，更感到無比的震驚，於是產生出一種不安的心態，稱之爲憂患意識。（註3）就是在面對國家憂患時，嘗試作出種種的抉擇，希望能爲中國找到自強之道。加上透過和洋人的接觸，發覺西方文化確有所長，故希望能將之引入，以圖富強中國。魏源（1794-1857）「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更是洋務運動的先聲。他如左宗棠强調「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於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儩以無也。」（註4），亦是士人憂患意識的表現。

是時，曾國藩亦講求「經世致用」之學，提出學習西方的教育主張。他嘗試在文化本位下，力求調和漢學「實事求事」的精神來從新演譯宋學之「格物窮理」。在繼傳統「修己治人」之學的同時，又極力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反對純粹心性的空談。他認爲宋學、官制、財用、鹽政、漕務、錢法、冠禮、表禮、祭禮、兵制、兵法、刑律、地輿、河渠十四項皆爲「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註5）這番主張在承傳統「修己治人」學說當中，亦强調了實學之重要性，主張學習和應用西方的科技，於是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曾氏採容閎（1828-1912）之議，在國內選拔聰穎之士，派遣赴美留學。學習軍政，船政，步算制造諸學。希望能藉此爲中國培養出一批人才，貢獻中國，達到經世致用的目的。他先後與李鴻章領導建立江南製造局、福建造船廠、開平礦務局、輪船招商局、上海機器布局等。以圖倣效西方的技術，希望富强中國。這等倣法，均表現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那種匡時救世的入世精神，表現了中國傳統中積極的一面。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洋務運動的發展。

另一方面，中國傳統中一些迂腐的思想，又極度阻礙了洋務運動的發展。最明顯的，莫過於傳統中自尊自大和盲目尚古的頑固保守心態。這種心態令中國人產生一種固步自封的思想，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的改革和進步。這無疑是探討洋務運動失的原因時，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從地理的角度來看，中國地處亞洲大陸最肥沃富裕的土地上，氣候溫和，加上天然資源豐富，使中國農業十分發達，經濟上構成了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成爲了農民聚居的凝聚力，世世代代定居的結果，令農民漸漸養成了安土的習慣。加上環境的穩定，使人們的行爲模式，皆成了一定。再者，農村生活所依賴的耕種技術，灌溉方法等，均極依賴前人所累積豐富經驗。正如學者韋政通所言「生活最重要的部份既由先所賜，於是對先人容易興起報恩意識和追慕祖先的意況」。從而形成了中國人普遍性的保守心態。

保守心態的形成和傳統儒家「內聖外王」的思想是不可分割的。所謂「內聖外王之道」實是中國古老的政治哲學思想，通過對古帝王理想化的方式，製造出道德上之完人供後人學習，而達到「治世」的目的，於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均被塑造成爲理想的人格典範。要士子們以之爲學習榜樣。久而久之，在士人的心目中，便產生了一種崇古的心態，認爲古代一切皆是神聖的、完美的，不論個人修養、齊家治國，均以古聖賢爲學習對象。認爲只要實現「理想人格」（內聖），便可以做到「理想社會」（外王）。這一套的治世主張，自實行以來，數千年不曾改變。在時代不斷更

新的同時，它只是徊徘於在固有的框框內不斷打轉，加上士子們對此篤信不移，影響所及，令中國文化傳統產生一種逆向的思維，在他們在面對嶄新的西方事物時，由於傳統的桎梏，不期然亦會大加反對。所以要從傳統內聖外王的思想模式中，是很難推出現代化的社會模式的，畢竟要變法自強，也不是只靠一個聖王來實現的。

再者，由於中國本身文化的早熟，數千年來，均爲東亞文明的中心，積累了豐富的文化遺產，所以對傳統的負擔，極爲沈重，難於極短的期間內，遽然放棄傳統，更改變革。而且長期被文化層次較低的國家所包圍，缺乏外來巨大文化的挑戰，故漸漸形成一種自大的心態，就是學者費正清（J.K.Fairbank）所指的「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cism）（註6）。把中國看成地理上的中心點，與其他國家形成「天朝」與「藩屬」的非對等關係，從而產生華夏第一的優越感。自尊自大，趨安拒變和盲目尚古的傳統亦漸漸形成。這種天朝心態，令中國人不會主動去了解和認識外國的文化和作出自我的批判。所以當洋務派提出夷情，講西學的主張時，無論是向西方學習，選派學生出國留學，還是興辦軍用工業，創建新式海軍等等，均立即遭到那些以繼承道統爲任的守舊份子的强烈指責，認爲變法破壞了中國數千年相承的治法。由此可見，洋務運動之主張學習西方，和中國傳統那種保守的觀念，可謂南轅北轍，相去甚遠。

三、保守觀念與洋務運動

由於傳統的儒家思想，有非常顯著的復古意識，理想中的典型，常在遠古的過去。形成了中國士人普遍的保守觀念，所以當洋務派主張改變承法，喊出師夷之長的口號時，無疑是對中國數千年文化傳統的挑戰。傳統思想根深蒂固的儒生，自然極力反對，爲洋務運動帶來了極大的阻力。由於這方面涉及的範圍較廣，所以這裡只選擇重要的來說明。

守舊勢力的挑戰

輝煌而悠久的歷史文化，令中國人抱有一種自大的天朝心態，常沉醉於過往的豐功偉績，對西方文化產生了一定的偏見和仇視。雖然鴉片戰爭的失敗，喚起了部份士人對中國國運的憂思，並試圖以改革來力挽狂瀾，但對當時大部份的士人來說，戰爭的失敗，並沒有開啟他們的眼光。他們的世界觀，依然停留於儒家理想中的狹隘的「五服」觀念上……五百里爲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以致對西方的專使，一律以貢使看待，令中國與其他邦國處於非對等之地位上。當時的中外關係，就如學者費正清所說，是建立於「朝貢制度」（Tributary system）（註7）。下及清季，這種情況已是根深蒂固，士人們實在無法向一個一向被視爲藩屬之西國求了解和認識的。

> 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直隸知州楊廷熙上奏云：「夫洋人之與中國，敵國也，世仇也，天地神明所震怒，忠臣烈士之所謂痛心，無論偏長薄技不足爲中國師，即多才多藝層出不窮，而華夷之辨不得不嚴，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借。」（註8）

更何況

> 「歷代之言天文者以中國爲精，言數學者中國爲最，言方技藝術者中國爲備。」（註9）

故又何需向西方學習呢！所以，在洋務運動展開之始，已遭遇到頑固士人的强烈反對。例如，實行洋務改革，必要向外國學習，但在當時普遍存在"嚴夷夏之防"的文化心理下，便遭到保守士人的强烈攻擊；又如在學習西方技術的時候，必要訓練一批掌握西方科技的人才，因此在培訓人才方面，不能再沿用傳統封建教育那一套。馮桂芬（1809-1874）在《校邠廬抗議》中，已經提出了「採西學」、「鑒諸國」的主張，他說：

> 「夫學問者，經濟所從出也。太史公論治曰：法後王，爲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愚認爲，在今日又宜曰。鑒諸國，諸國同時開域，獨能自致富强，豈非相類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較著者？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爲原本輔以諸國富强之本，不更善之善者哉？」（註10）

他的主張，無疑與傳統中國以文字爲形式，儒家經典爲內容的教育制度產生了極大的矛盾。亦一再受到頑固士子的猛烈攻擊，把破壞祖宗承法的帽子扣在他們頭上。當時的大學士倭仁

曾国藩画像(清内府原藏)

（1804-1871），便是那班頑固士人的代表。在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他上奏光緒云：

> 「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爲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咸豐十年，稱兵犯順，憑陵我畿甸，震驚我宗社，焚燬我園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來未有之辱，學士大夫無不痛心疾首，飲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與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哉？議和以來，耶穌之教盛行，無識愚民，半爲煽惑。所恃讀書之士，講明義理，或維持人心。今復舉聰明雋秀國家所培養而以有用者，變而從夷，正氣爲之不伸，邪氣因而彌熾，數年以後，不盡中國之衆咸歸於夷不止。」（註11）

又如四川按察使方濬頤說洋人：

> 「彼之人無禮樂教化，無典章文物，而沾沾焉唯利是視，好勇狠，恃其心思技巧，以此爲富强之計，而我內地奸民與之勾結煽惑，陳書當道，幾幾乎欲用夷變夏。夫豈知中國三千國三千年以來，帝王代興，治亂循環，惟以德服人者始能混一區宇，臻安黎庶。……而所謂天錫勇智，表正萬邦者，要不在區區器械機巧之末也。曰有本在。本在何？在民。」（註12）

倭仁和方濬頤的言論，一則反映了他們對天朝心態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的情緒化傾向，二則表現了他們對西學西藝强烈排斥的心態，亦是當時大部份士子思想的寫照。

守舊派認爲，洋務派所提倡的學西學，造船製炮，設立機器局，開礦等等，均有悖於傳統文化中重義輕利的大原則，和他們心目中儒者"存天理，去人欲。"之至理名言，可謂水火不容。在這班守舊士人的眼中，自强之道，乃在於"正人心"，如楊廷熙說，"修德行政，實千古之臨御之經；盡人合天，乃百代盛强之本。"（註13），認爲「中國之所持者民心也」（註14），自强之道，不在技藝而在人

心。以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學的傳統說教來攻擊法西方的洋務主張，以"祖宗之法不可變"（註15）爲大前提，大力攻擊主事改革的洋務派。由於他們多在政策制定上有直接的影響，故令洋務事業處處陷於困境，不少改革份子如郭嵩燾（1818-1891）、丁日昌（1823-1882），均被批評得體無完膚，不能爲士林所容。而且也令不少有志於改革的人士，不願積極從事，以免遭到批評，官位難保。

傳統的桎梏

另一方面，雖然洋務派力主破除成法，與傳統保守士人對抗。但和那些保守士人一樣，他們亦是科舉出身，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尊崇儒學和講求孔孟、程朱之道德修養。如曾國藩雖講求「經世致用」之實學，有主張學習西方技的教育主張。但畢竟，他仍是科舉出身，骨子裡深受傳統文化教育的影響。鴉片戰爭時期（1841），他仍追隨理學家唐鑒（1778-1861）「以朱子之書爲日課，始肆力於宋學矣」（註16）對其子弟，曾氏亦訓以「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二書，此外各書，能讀固佳，不讀亦初無所初損，可以爲天地之完人，可以父母之肖子。」（註17）鴉片戰爭後，曾氏才清楚看到，身心性命之學和儒家之仁義道德，亦抵擋不了列强步步的軍事進迫。相反西方教育「求學實濟，無論爲士、爲工、爲兵、無不入塾讀書，共明共理，習見其器躬身其事。」（註18），才是中迫切所屬，尤其以技術爲重。於是才產生「訪摹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習試造，以勤遠略」（註19）之議。但可惜的是，他對西學之認識，也只是僅此而已。其他的維新人士亦深信「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註20）因此，他雖然被指違反祖宗承法，但骨子裡，他們仍然維護儒家之名教綱常。在進行改革時，從傳統之儒家學中找尋理論上的根據。他們把中國傳統分爲兩個部份：義理和製器。前者是千古不變的，而後者則可以改變。對西方文化亦如斯泡製，認爲西方之輪船，機器，火車仍可以學習的精華，其餘一切，皆爲可棄的糟粕。（註21）張之洞（1837-1909）在《勸學篇》內篇第三〈明綱〉云：

「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議。聖人所以爲聖人，中國所以爲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

故曰：

「中學爲內學，西學爲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素於經文，而必無悖於經義。」（註22）

故有「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思想的出現。成爲洋務派作繭自縛的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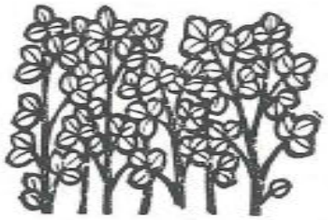
所謂中體西用，是指在堅守文化本體，「不畔三代聖人之法爲宗旨」（註23）之前提下，學習西方富强之術。亦即是馮桂芬所言之「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爲原本，輔以諸國富强之術」（註24）「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八字，可說是概括了整個洋務運動之精神，成爲了洋務運動的主導思想。

中體西用之思想，試圖把外來文化屈服於本位文化下，表現了傳統思想對洋務的桎梏，爲整個洋務運動劃下了一條底線，成爲限制西方思想文化傳播的阻力。正如內地學者侯玉臣所指出："中學爲體，嚴重地壓制了文化的傳播，尤其是當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和文化藝術出現後，洋務運動便由積極學習變爲堅決反對。"（註25）可見洋務派雖力求改革，但他們的眼光，比起那些守舊人士，亦不見得高明。守舊士人和他們所不同的，只是連器物的改變也不能接受而已，保守的本質依然沒有多大分別。而洋務運動中所辦的一切，便是在「中體西用」這個框框下展開的。

對西方文化的一知半解

傳統的固圍，令改革派亦無可避免地受到傳統保守思想的影響，加上主事改革的士人如左宗棠、李鴻章、曾國藩等，均來自舊社會，對西方文化認識，亦只限於在對外戰爭中所接觸到的西方武器，對於西方新興的工業文明，依然存有狹隘和錯誤的看法。如曾國藩於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上奏曰：

「購買外洋之物，購成以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習之，繼而襲造。」（註26）



恭親王奕訢亦於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奏言：

「識事務者莫不以采西學制洋器爲自强之道。」（註27）

1861年，林則徐的門生馮桂芬，寫成《校邠廬抗議》一書，爲洋務思想的代表作，書中除了表達了中體西用的思想外，又表達了對魏源師夷制夷之語的贊賞。他說："蠶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語爲得之。"（註28）雖然馮氏對西方文明的認識，比魏源的時代更爲進步，但重點仍然放在船堅炮利上。他說："然則有待於夷者，獨船堅炮利一事耳。"（註29）中國富强之道莫不過於"師夷智造炮製船。"（註30）就是洋務運動的中堅份子李鴻章，亦有「中國文化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註31）的狹見。

由於主事大臣對西方文化的認識有限，這個以自强爲中心的新政，便陷入局部化之窠臼中，只徘徊於器物層次之模倣上，而其中又以軍事的改革爲主流，教育、經濟、外交爲輔。對清代固有的制度成法，均不敢作出改動，而且絕對未明固中的重要。所以自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曾國藩在安慶設軍械所起，至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的十九年間，大大小小的軍械造船廠相繼成立，從事軍事工業的生產。如上海製炮局、蘇州西洋炮局、江南製造總局、福建船政局、天津機器製造局等。惟因技術落後，加上管理不得其法，實際成效均未如理想，福州，上海二局雖云有成績，但亦只能做製中國舊式船隻，質素和速度均未如理想。

由於李鴻章認爲學習外國利器，莫如「覓製器之器」，故有輸入機器之學。根據資料記載，機器的輸入，由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的398,407兩增加到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的1,119,777兩，主要用作製造軍械，輪船方面。可惜此等機器，多爲外國所棄的二三流貨色，而所謂的西方先進科技，又多是過時的舊技術。可見洋務派對西方科技的認識，亦是十分貧乏，以致巨額的金錢，白白浪費在廢

船舊炮的購置上。正如時人王韜（1828-1897）在《弢園文錄》中所譏言：

「所製輪舶，悉西國古法，不值識者一噱！」（註32）

作爲改革主流的軍械製造尚且如此，其他輔助性的教育、經濟、外交改革自不待言。在教育事業方面，同治年間京司同文館和上海方言館的設立，以及光緒年間水師學堂和武備學堂之開設，並非標誌着西學受到廣泛的認同和教授，卻表現了教育改革嚴重的偏向性。最重要一點是，當時的主事改革者，並不把學校視作一個獨立自主的教育機構，而是各洋務機構的附庸。正如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奕訢奏請建立同文館時所說：

「臣等伏思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譯其語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註33）

所以就內容來說，無論是國內西學館，還是選派留學生出國，均不出語文、軍器、造船、工藝之範疇。由於以洋務機構的需要爲出發點，不論是京司同文館、北洋武備學堂、北洋水師學堂、福州船政學堂等等均著重外文翻譯、數學、西方軍事技術、造船等科技的學習。此舉充分表現了洋務派在教育改革上的偏向，只許學西文西藝，而不許學西方政教制度和民主思想體系。如此片面性的教育改革，限制了西學發展，不能培養出眞正之人才。以致成立十多年，學館的發展仍十分緩慢，不但不能取得社會的廣泛認同，而且力量仍不足以對舊教育制度和舊文化造成任何的威脅。這亦是構成洋務運動失敗的一個間接因素。

在經濟上，爲了滿足軍事建設的需要，故有工商實業的開辦。當時開辦的工商事業，多以官督商辦爲主。可以想像得到的是，既是官辦，官場中一切貪污，奉迎等的陋習亦隨之而來。這些機構的主事者，多是洋務大臣的依附者，由於缺乏政治上的勢力，加上遭到官辦商業的排斥，往往難以生存。在種種的限制和狹視下，當時所開辦的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布局、天津電報總局等，均不堪用。時人鍾天緯評曰：

「每年用正款以數百萬計，而所成之物，若經由外洋購買，或由洋匠承包，費可減半。官廠每制成一器，價比外洋爲昂，而復草率不精，形模徒具，往往取笑洋人，旋生悔悔，如此雖百年，終無生色。」（註34）

可見在僅有的鐵路、電報，開礦之建設中，不單絲毫沒有爲國求富的能力，反而成爲商業發展之障礙，以致開辦二十多年，終一事無成。

外交上的改革，亦乏善可陳，雖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但由於傳統嚴華夷之辨這守舊思想的桎梏，士人多不屑當外國使節，而且組織鬆散，職權又無明確界定。所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名義上雖是專責外交事宜的機構，但實則上作用並不大，除了擴闊了部份外交人員的視野外，其他的一律不值一提。

四、中國傳統和西方模式改革的矛盾——中體能否西用

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之役，使中國在西方船堅炮利之下吃了大虧，令中國天朝上邦之形象掃地。這個深重的危機，令中國產生了更弦變革之思想，故有洋務運動的出現。洋務運動的目的，就是嘗試在中國建立一個西方模式的軍事，經濟制度。主事者雖極力模倣，唯仍未認識到西方之富强，自有其文化、學術、制度上的背景。西方諸國之所以能自强並建立獨特的現代化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其獨有的文化背景及傳統。所以洋務運動在提倡學習西方時，由於忽略本身文化傳統與西方的不同，以致造成「劃虎不成反類狗」的現象，使之終以失敗作結。洋務運動的破產，正好說明了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制度模式之格格不入，在缺乏一個適合的客觀環境下，故西方的制度未能植根於中國。

用中國古老的哲學範疇來說吧。每一個文化的發展，必有其「體」「用」的配合，前者是事物的根本，而後者則是表現事物主體的形式。當一個文化按照自己的軌道前進時，「體」和「用」的配合是一致的。當一種文化遇到另一文化時，會產生文化衝突（cultural conflict），其結果必然是强大的一方以自身的「體」去吸收外來文化的「用」，從而豐富擴大自己。在悠久的歷史中，中華文化多次成功地把外來文化吸收過來，如戰國時的「胡服騎射」，儒釋道之融和等等。但當時的中國文化正處於一個高峯時期，所以能輕易地把外來文化吸收過來，融滙貫通，豐富自己。但近代的情況則不同了，長期的禁海政策，使中西文化給隔絕起來，適逢西方的工業革命成功爲西方建立了新的文化體系，所以當中國古老文明再與西方新興的工業文明接觸時，立刻相形見拙，老朽的中國文化之「體」，能否再承受氣象萬千的西方文化之「用」，成爲重要的問題。

西方文明價值乃源於理性的精神，使法治的基礎能植根於其上，形成一獨立體系，發展高度理性運作的制度模式。在這個「體」之下，科學技術和經濟力量才得以高度的發展。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其作《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認爲理性精神和新教倫理有密切的相關，雖然此說多有爭論，但已說明了理性精神實爲西方文化之「體」。故有其「用」（科技經濟）之配合。反觀中國文化，其體在於仁，而價值之源在於一己之心，通過個人的之修養，外通於他人而至天地萬物。而達到求取自我人倫秩序中的和諧的最終目的。其用則放在個人的自反、自省、求諸內的個人修養成爲關鍵的所在。

韋伯認爲，西方的科技和經濟之所以能高度發展，源於一種理性的精神，以一個穩定

的，大公無私的可計算法律（calculable law）作爲基石，使行政機制能植根於法治的基礎上，形成一體系，而發展出高度理性運作的制度模式。但歷史上許多的事例文字獄的案例告訴我們，中國就是缺乏了法治的基礎及理性的精神。因爲在儒家思想大一統的原則下，天子受命於天，而天下則受命於天子，故天子有着絕對的權力。在封建皇朝裏，人人均視之爲金科玉律。成爲阻礙國家發展的糟粕。

法治的基礎，使西方能建立一個科層政權（bureaucratic state）（註35）根據理性法律權威（rational legal authority）使制度能良好運作。反觀中國歷史，自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統一天下以後，確立了眞正的獨裁統治，後漢武帝的罷百家獨尊儒術，更正式將之確立成爲傳統，它賦與統治者絕對的權力，形成父權（partiarchal）政府。以傳統權威（traditional authority）來支配人民，它的喜怒無常，使中國缺少合理的法律性。在這情況下，人民除了服從支配者之命令，別無他途。下及清朝，這成制已經形成根深蒂固的傳統。可以理解的是，當權力集中於皇帝一人手中時，個人的喜好，往往成爲是非的標準，影響到法律的穩定。再者，在封建社會裏，天子之言便等同於法律。在缺乏一個理性的法律基礎下，洋務派所辦的西式事業，亦因此而不能成功發展起來。根據韋伯的說法，傳統權威仇視變遷，仇視理性之探討，極不適合現代工業制度的發展。所以雖有洋務大臣大興工商實業，且終無法成功。

再者，理性的精神，體現於紀律性和公私分明。但中國傳統中着重人倫致協的關係，大大地阻礙了這種精神的發展。儒家思想的最高理想爲「仁」，而最終之精神價值則爲「禮」，禮之表現在國家爲忠君之觀念，表現在家族上則爲孝親，此等觀念，構成了儒家社會倫理的主要內容，這觀念的擴散，便形成了中國社會間的一切倫理關係。所以統治制度即是家長制之擴大。造成以人際關係統領事由的傳統。深厚的血緣關係，表現出强烈慈善主義之特點。（註36）故有所謂人情的出現，嚴重地阻礙了理性精神的發展，使改革流弊叢生。如洋務時期的上海工業，主事人多是依賴李鴻章的關係，而取得開辦的權利，這些官僚，富紳，「大率執袴居多，其人本不知稼穡之艱，焉知大體，唯好爲排場，任其揮霍。」（註37）時人兪賢在《卹商論》中評曰：

「即如機器織布一局……屢易其人，無不虧空，而未常織成一布一事也。」（註38）

可見悠久傳統所帶來任用私人，假公濟私的陋習，和公私分明，注重紀律之西方機制，產生了很大的出入。正因爲這樣，西方模式的制度，便不能建基於中國。這方面亦說明了洋務運動失敗背後的一些文化因素。正如梁啟超在《新民說》中曰：

「凡一國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特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自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的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後羣乃結，國乃成。」（註39）

以上粗略的分析，正好說明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注重血緣關係的家族，注重實質倫理的法律和高度集權的政府和注重法律，公私分明分工有序的西方機制產生了很大的出入。由於缺乏一個適合的客觀環境，妨礙了西方理性觀念之發展，令西方制度故未能植根於中國。就是單是器物上的模倣，亦以失敗作結。但我在這裏並沒有完全否定中國文化傳統之意，相反，傳統中一些理念是藉得肯定的，如儒學中强調道德和學問的修養，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對社會政治的影響，如果能作出適當的轉化，在推動個人的修養和學問上，亦有一定的意義。相反，傳統中一些腐朽的，落後的觀念則必需要剔除。歷史的發展告訴我們，台灣，香港現代的成功，和儒家亦有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關於這方面，很多學者已作出了詳盡的探討，這裏亦無意再詳細介紹了。

五、總結

悠久的歷史文化，令中國對傳統有着沉重的負擔，眷戀着過去的一切成就。爲這個古老的民族帶來極大的障礙。鴉片戰爭以後，西方文明之湧入，令一部份士人如夢初醒，意識到中國有自强的必要。洋務運動之展開，無疑是中國人之一大創舉，爲當時的社會，帶來一股進步的思想，亦爲當時中國的困局，找開了一個缺口。因此在洋務試辦之初，得到了不少有識之士的重視和贊許。

可惜的是，在傳統保守觀念的桎梏下，令洋務運動不能放棄傳統的固囿，作出全面的改革。以致這個改革運動有着嚴重的偏向性，只重器物模倣而忽略制度文化。事實上，當時之改革者，仍抱着感情上的偏見，拋棄不了天朝大國這個沉重的包袱。於是對改革抱着一種欲迎還拒的態度，一方面既對西方文化感到無比的震驚，且有模倣之意，另一方面又不想違反傳統的道德觀念。以致對維新事業感到十分矛盾。話雖如此，一般的士人對西學仍抱有十分大的偏見，就是主事改革的重臣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諸人，亦堅持在本位文化下，對西學作有限度的模倣，故有「中體西用」這個思想的出現。爲洋務運動劃下了底線，限制了洋務運動的發展。

傳統的桎梏，已爲洋務運動埋下了失敗的伏線，再加上保守人士之阻撓，把洋務運動帶入死胡同中，甲午之戰，終把洋務運動四十年之自强成果，化爲灰燼，而洋務運動維新自强的理想，亦成爲子虛烏有。洋務運動的失敗，和傳統之桎梏是不可分割的，因而令學者注意傳統與現代化的矛盾。以現代的眼光來說，傳統阻礙現代化一說或已經過時。但傳統文化和洋務運動的關係仍是不可忽視的，在促成它失敗的同時，亦反映了中西文化價值的不同。再者，西學東漸的結果使得傳統日漸式微，加深了人們對中西文化的反省，爲了要重新振興中國，復興文化，知識分子從而要求一個更深層次的改革，於是促成了戊戌變法的出現。

備註：

1. 蕭一山：《清代通史》。北京：中華書局，第三册1986 PP.840-842。
2. 賈禎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第四册，P.1455。咸豐朝，卷72，頁十一
3. 語出徐復觀
4. 左宗棠同治五年，五月奏稿：轉引自《清代通史》第三册，P.878。
5. 《曾文正公日記類鈔》卷上。
6. J. K.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68, PP.1-4。
7. 同上書，P.63
8. 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第二册，P.17。
9. 同上P.45
10.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採西學議。
11. 《籌辦夷務始末》。第六册，P.1142。同治朝，卷四十七，頁廿四。
12. 《洋務運動》。第一册，P.455。
13.14. 喻盤庚："對洋務派與頑固派鬥爭性質的再認識"『中國近代史』月刊，一九八九年十月號，P.65。
15. 語出榮祿，轉引自鍾志强論文"洋務運動失敗的一個剖析"『史潮』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歷史學會，1983 P.9。
16. 曾國藩：《曾文正公日記》。卷上。
17. 曾國藩：《曾文正公家書》。卷五。
18. 《約章成案匯覽》。乙篇，卷三十二上。
19. 曾國藩：《曾國藩未刊信稿》。
20. 《籌辦洋務始末》。第五册，P.624。同治朝，卷二十五，頁九
21. 劉再復，林崗：《傳統與中國人》。P.268。
22. 同上 P.269。
23.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自序
24. 同上採西學議。
25. 侯玉臣："試論中體西用的文化政策"社會科學（甘肅），1984年第三期。
26.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 P.417。
27. 《同治中興京外奏稿篇》。卷五。
28.29.30. 馮桂芬同引上書，制洋器議。
31. 《籌辦夷務始末》。第五册，P.624。同治朝，卷二十五，頁
32. 王韜：《弢園錄外篇》。變法下。載於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㈠，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P.136
33. 《籌辦夷務始末》。第五册，P.624. 同治朝，卷二十五，頁九
34. 鍾天偉：《擴充商務十條》。載於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册，P.218.
35. 劉創楚，楊慶堃：《中國社會從不變巨變》。P.170.
36. 劉再復，林崗：《傳統與中國人》。P.249.
37.38. 語出兪賢《卹商論》，載於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册，P.216.
39. 梁啟超：《新民說》。上海：中華書局 1941.P.6.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回顧與前瞻

無竹（社會二）

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地結束「文化大革命」，並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及「政治體制需要適時地進行改革」等觀點。本文就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爲分水嶺，探討十年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展，及產生的回顧。

㈠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因

文革的結束，中國在政治領域上存在着很多問題，迫使中國共產黨，提出「理性」的政治體制改革構想。

首先，在文革期間，革命的意識形態和羣衆運動失去作用，一些嘗過苦頭的幹部，明瞭到政改對當時政府架構及行政系統的必要性，遂提出政改的要求。

第二，十年文革，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失去信心，黨的威信動搖，政權的認受性（legitimacy）受到嚴重挑戰，出現三信危機（即信心、信仰及信任）。在此情況下，政改顯得迫切的需要。

第三，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開放改革，一些較保守的黨員對此抵制，阻礙開放的步伐，爲使暮氣沉沉的黨和國家機關再次振作，打擊保守勢力，建立政治體制改革路線，以求政策與方針得以貫徹執行。

第四，中國的經濟開放與體制改革的引入，必使權力下放，爲了配合經濟體制上的改變，政改也應相應提出。

在以上種種原因，政治體制改革成爲「開放改革」時代的重要構思。而過去十年的政改，不是風平浪靜，反覺得崎嶇絕望。

㈡鄧小平的「八一八」講話

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發表了《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註1），他提出：「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來說，主要的弊端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份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註2）而他針對這些弊端，提出了一些具體政改建議，其中包括：㈠修改憲法；㈡中共中央設顧問委員會；㈢建立從國務院到地方各級政府從上到下的工作系統；㈣各國企業事業單位成立職工代表大會；㈤各級黨委眞正實行集體領導和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註3）而這篇講話更成爲日後政改的藍本。

雖然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出了黨政分開，解決以黨代政的問題，但具體內容上，未見突出。相反地，鄧小平似乎最希望建立一個健全的黨與政府官僚制度；在不影響黨對權力的控制下，透過制度上的改變，鞏固黨的地位，維持一個廉潔，高效能的黨和政府。

在「八一八」講話發表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員廖蓋隆提出了「庚申政改」的政治構思。（註4）可是由於改革幅度太大，內容涉及的人和事太多，要求黨內外與政府的全面改革，嚴重挑戰黨的權威性（Authority），後來便不了了之。自此之後，整個政改的討論，只是斷斷續續的進行，始終未能達到具體的結果。

㈢十三大：政治體制改革再次提出

自「庚申改革」方案後，政改的討論沉寂一時，直至八六年間，這些討論才恢復激烈，而當時的知識份子，如費考通（註5），方勵之（註6），也紛紛提出意見。同年七月至八月間，中共在「北戴河會議」中，以鄧小平爲首的改革務實派與陳雲等的元老派，對政改發生激辯。最後，在互相妥協下，於九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中，通過《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決定擱置政改。

在十月，正式成立胡啟立，朱厚澤，田紀雲，王兆國等的「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全面研究政改的問題與設想。同期，雖然學生抗議事件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使胡耀邦下台，但政改的討論未被拖延。相反，《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註7）在八七年的十二屆七中全會中提出，並在十三大趙紫陽工作報告中發表及予以通過，政改的呼聲又再次喚起。

而十三大的中心主題是改革與開放，並且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觀點，提倡實事求是路線，而前馬列史主任張顯揚更認爲這是「馬克思原理深化發展」（註8）容許較大幅度的轉變，強調黨政分開的特別需要。有關政改的主要內容，在報告中的第五章《關於政治體制改革》提出：㈠實行黨政分開，要求劃清職能，調整黨的組織及工作機構；㈡下放權力，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職責；㈢改革政府工作機構，裁減冗員；㈣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㈤建立反映意見渠道；㈥提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㈦加强法制建設。（註9）

而報告中，又提及改革本身內部的建設，內容包括：㈠建立建全的集體領導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設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增加中全會的開會次數；建立工作規則；地方各級組織相應建立議事規則等。㈡改革和完善黨內選舉制度：明確規定選舉的提名程序和差額選舉辦法。㈢制度保障黨員權利的具體條例。（註10）

總體來看，這是一個頗爲全面的政改構思，而政改的成與敗，將決定於能否做到「黨政分家」。其實，政治體制改革本體上，已經存在着若干問題，而這些中國特有的問題，會成爲政改的最大障礙。

㈣政治體制改革的障礙

自一九八〇年，鄧小平的「八一八」講話至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趙紫陽工作報告，政治體制改革斷斷續續的推行，卻遇上前所未有的困難，而這些問題，足以令政改完全失敗。

四項堅持：（即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註11）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大障礙（註12）。因爲中國，任何事情都不能違反四項堅持，而四項堅持是無上權威，不可侵犯的。政改的推行，往往與四項堅持有所抵觸，「黨政分開」就永遠永遠也不能了。此外，四項堅持更成爲保守派攻擊改革派最有力武器。最重要的是四項堅持沒有清晰的定義，任由當權者解釋，任何改革都可被指爲違反四項堅持。如八一年發動的「批白樺運動」；八六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都是在維護四項堅持的原則下推行，故四項堅持是政改的底線。

既得利益者的阻撓：當代中國政權，仍然是由第一代革命先驅掌管，儘管他們名義上已經退休，但他們在政治上，仍然是「拍板者」。他們對於政改，絕對不容許有太大幅度的改變，尤其是黨的領導地位，所以制定改革計劃的高層人士，也顧及老人家的心意。

民主制度不完善：現行的社會主義特色的民主，强調黨與人民的關係（民主集中制），與西方式的民主截然不同，偏重單向傳釋，缺乏民意，對政改有一定的阻礙。

黨的內部矛盾：以鄧小平爲首的務實改革派，面對陳雲、彭眞等的元老，往往因政改的程度和速度上，發生衝突，每次政改的推行，都要先得黨的內部妥協，方可執行，而政改也因此而拖延或擱置。

㈤十年政改的成效

十年來，政治體制改革始終未能解決以黨代政，黨政合一的問題，因此，在政治架構上，沒有顯著的成効，只不過是權力與職份的內部轉移，缺乏具體的「黨政分開，民主政治。」可是在行政改革（administrative reform）上，提出了一些行政及人事制度的變化，使在退休制度上、公務員制度上，及國家行政架構上，有較完備的改革。

㈥政治體制改革的前瞻

由於黨政不分，政改的速度受到制肘，當代政治架構，不但沒有改善，反而出現了官僚主義，貪污受賄、官倒等問題。引發八九年的學生運動，要求全面的改革，嚴懲貪污。可是，老人家們絕不容許「黨權」下放，勢必牢牢緊握權力。

自六四之後，儘管中國對外多次強調改革與開放不變，政治體制改革仍停滯不前。不過，經濟改革的深化加速，經濟制度系統轉變，爲配合其發展，相信政改的聲音會再次提出。

㈦小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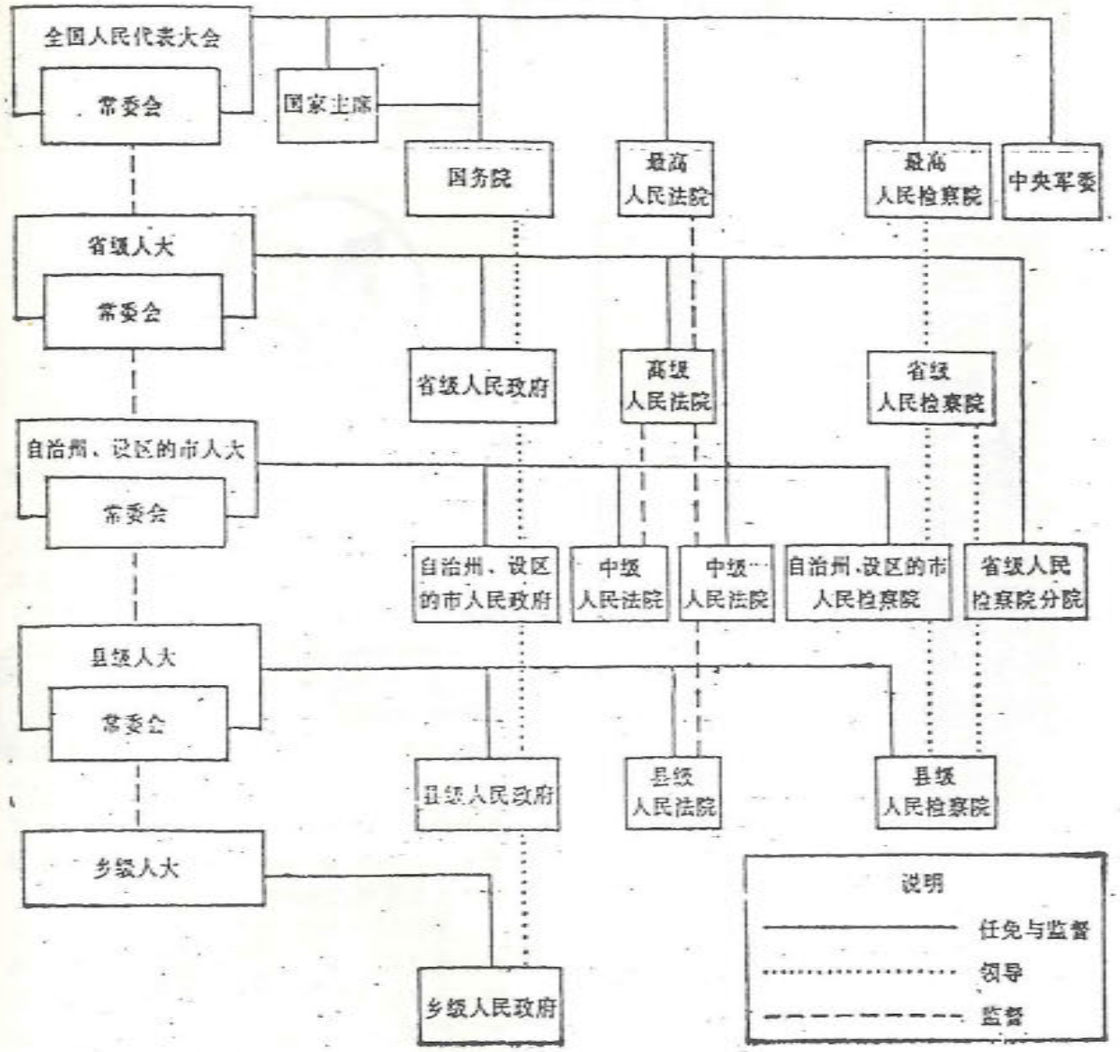
總括而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迫切需要的，但黨政不分的障礙一日未清除，政改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實現，或許等到「老人政治」完結，政改才眞正有希望。

註釋

1《鄧小平文選》 P.280—302
2 同上 P.287
3 同上 P.299—301
4《沿着黨所選擇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前進》
5《人民日報》八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6《人民日報》八六年八月十二日
7《十三大工作報告》
8《百姓》，156期
9《十三大工作報告》
10《十三大工作報告》
11《中華人民共和國八二憲法》：序言
12 Liu, Kuang-hua(1987), "The Limitation of Communist China's Political Structural Reform", Issues and Studies, 9

參考資料：

1.《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八二）》
2. 鄧小平（1983），《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
3. 趙紫陽，《十三大工作報告》
4. 百姓，156期，1987
5. 鄭謙等（1988），《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發展概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6. 浦興祖編（1990），《當代中國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7. Wu, An-chia (1987), "The Possible Impact of the Political Reform on Mainland China's Politics", Issues and Studies, 12
8. Chow, King W., (1988), "The Management of Chinese cadre resources: the politics of performance appraisal (1949-84),"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9. Liu, Kuang-hua (1987), "The Limitations of Communist China's Political Structural Reform", Issues and Studies, 9.



圖：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架構

鄭謙等（1988），《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發展概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書評：《朱元璋傳》

牛鬼蛇神（社會二）

書名：朱元璋傳
作者：吳晗
出版社：香港傳記文學社
出版年份：一九八零年

吳晗是近代知名的明史學家，他擁有一雙敢直的手，具太史公有言不諱的良風，而且史識過人，每事尋根究底；永不言倦。而他在《朱元璋傳》中就表現出他的良史之風出來，而且在字裏行間常用活潑的文筆來對歷史作出種種獨到的批評，彷彿有以「古」警「今」之功用，故看本文時愈看愈有深意，實爲可使古爲今用的一部「史」書。

這本《朱元璋傳》是吳晗先生所寫的最後修訂版本，吳晗由一九四三年寫作關於明代開國皇帝的生平事蹟，原本書名爲《明太祖》，再經過三次的修訂重寫，結果在一九六四年四月修改結束，名爲《朱元璋傳》，翌年由三聯書店出版。書名的內來，在書後記作者有云：「舊時代舊史家對皇帝有太多禁忌，習慣以皇帝廟號作稱呼，今天這種禁忌已經不存在，大可不必自找罪受，不如用原來名字稱呼，還給他以人的地位。……全書因之就題作朱元璋。」其實，吳晗先生在改書名中也表現他的用意。《朱元璋傳》寫起來像故事一樣，直呼名字可使全書像小說形式的敍述更連貫，以平等的高度來對待一個歷史人物可使描述更客觀，免去以前以「下」記「上」的習慣，實爲有見識之舉。其次，以人名稱呼可使讀者更親切，使史學變得更平易近人，而且以人名直呼皇帝名字更可爲吳晗將明太祖影射蔣介石及毛澤東鋪路，大有實用之意義。

至於《朱元璋傳》的內容，作者把這個由貧民出身晉昇至皇帝的傳奇人物的一生重要的事蹟，及其統治國家的情況，以最豐富的歷史文獻爲依據；作者在敍述朱元璋的一生時並兼論了明代的制度，皇室的情況、官員及人民心情及他們的心理、及朱元璋能夠成功的原因。故此；朱元璋的傳不單單只是記載朱元璋的生平事蹟，還記述了有關明初的完整歷史，以個人帶出歷史的方法與中國史書的「紀」同類，但這比「紀更爲完備，接觸面也其廣，充份反映了明初皇帝專權所引發的全國軍政系於君主一身的後果。

《朱元璋傳》分爲六章：

1. 小流氓
2. 紅軍大帥
3. 從吳國公到吳王
4. 大皇帝的統治術
5. 恐怖政治
6. 家庭生活

每一章裏分作數個小標題。前半部份，由朱元璋出生至稱帝，作者以時間的先後次序寫朱元璋的事蹟；後半部份，作者分開敍述朱元璋的統治狀況及其皇帝家庭的生活。此外，與主角有關的時代背景也有交待，穿插於每章裏面。

第一章：先交待元朝中葉時期鍾離太平鄉人民生活的慘況，主角朱自重八就出生於貧窮的家庭。少年時候，朱重八與鄉童爲伍，後來天災仍頻，重人入寺剃髮，以安頓兩餐。及重八長大，其寺遭元軍燒毀，唯有投靠郭子興反抗元朝的部隊。這章開首就有點像章回小說，全不像是一篇受史實支配的文章；吳晗先描述朱元璋本人及其他主要人物也十分細緻、事事解釋得合情合理，幾能連朱元璋的感情、思想也能寫得一清二楚，而且點點有引可索，如在第十六頁有一段說朱元璋由星覺寺投入紅軍就寫道：「就開始結交朋友，物色有志氣有膽量敢作敢爲的好漢，時時進豪州城探訪消息，同時也立志多識字、多讀書。不久，便被人發覺他是一個不安份的傢伙。」以上敍述在普通史書很難找到，這樣輕描淡寫的敍述是從《天潢玉牒》、《皇朝本紀》中找出來，除了一些通博羣書的專家外，這是勢難辦到的；這樣人物便更生動、更傳神了。

明太祖朱元璋像。

第二章：描述重八在郭軍中立功見威，成爲郭子興義女的夫婿，改名爲元璋，開始建立他的功業。其後郭子興死，元璋妙計殺郭天叙，收其部衆，攻下集慶（南京），鞏固基地。

第三章：敍述朱元璋在芸芸羣雄裏險中求勝，先擊敗實力最強的陳友諒部隊，扭轉了局勢，再吞滅西面的張士誠，然後掃平南方的割據勢力。南方已定，元璋派兵北伐，在他四十一歲時，攻入大都，逐走元順帝，建立明朝。吳晗在這章裏對戰爭的描述及各軍戰策的運用瞭如指掌、看其書好像身在戰場一般，比起未修攻前的《明太祖》完備得多；在這章裏，吳晗先生的觀點比較客觀，無明顯的褒或貶朱元璋。

第四章：介紹朱元璋統治國家的手段，包括調查人民戶籍、擴充軍隊和設立官僚機構。此外，也揭露朱元璋怎樣付曾經依附的明教各教衆。在這章裏，吳晗的文字偏於貶朱元璋、常有變態，惡毒等字眼。

第五章：揭示明初的恐怖政治，包括對忠臣的猜忌和殺戮，文字獄下喪命的冤案及時務機關的暴行，也說到皇權在這時已到達了極點；幾無人能加以制衡。在這章吳晗對朱元璋的反面批評最多，字裏行間顯得十分痛恨。

第六章：寫朱元璋的家庭生活及其晚年的景況，描寫他對子孫的悉心培育及對其他人的猜疑、怕江山被奪、死於猜疑、害怕之中。在這章吳晗的態度有了改變，表現了一種獨裁者可憐的下場。

書末有附錄，是朱元璋年表，把他由出生至去世的身份，分別列出公元與紀年，及生平中一些重要的大事。是全書索引的部份。

吳晗企圖在《朱元璋傳》中打破以往史學界的慣例，將嚴肅的史料搬進有趣、有情感的框框之內；但可能作者對於專制的獨裁多加痛恨，故有對一大段對朱元璋的描述用上厭惡的字眼，在吳晗另一篇作品《論皇權》裏曾說：

「流氓兼强盜的朱元璋，作了皇帝，建立皇朝以後，史書上不都是太祖高帝嗎？」（摘自《皇權與紳權》）。

而又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朱元璋傳》自序中說：「是由於當時對反動統治蔣介石集團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雖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歷史上朱元璋應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罵槐。」

由此可見，吳晗作此書初版時，有意藉着批判朱元璋去影射當時國民黨的獨裁者蔣介石，故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及個人的愛恨，又例如作者對反抗元蒙政府的軍隊稱爲"紅軍"，也把讚揚共產黨軍的情懷投射在"紅軍"身上，因爲向來幾乎無史家稱元末羣雄的軍隊爲"紅軍"的，至於紅色代表的是一個新主義的興起。實有以古喻今之效，這裏充滿了吳晗先生對正義的追求及眞理的渴望的心理。《朱元璋》是有志而作的作品。

另外一方面可見吳晗是有意將《朱元璋傳》作爲影射當時人物的媒介的理由是他在六十年代對本書的重新改修。原先，朱元璋在他心目中是一個革命英雄，是一個理農民出身的領導者，這和當時他心目中偉大領袖毛澤東一樣。但，六十年代開始這個領袖也同樣走上朱元璋的專制獨裁的舊路，他把「農民出賣了」，把自己的開國忠臣逐一迫害致死，本書爲作者告示了一場深切的哀痛。而吳晗作此書實有爲民請命的雄心，直書不諱希望可告戒統治者前車可鑒。

《朱元璋傳》文字流於口語化（北京語），作者在付印前的自序坦白地承認了。例如第一章有「剩下四口人，糧食一顆也沒有，地裏的呢，一旱一蝗，收到的不夠交租，那來吃的！」流於口語化是本書的一個特點，也是史家常執拘的地方：但作者這樣做是有其深意的，他非常重視歷史知識的普及工作，曾說過：「單有提高，沒有普及，只是少數人提高了，大多數人還是一窮二白，而著史是爲了使人人懂得點自己和別人國家的歷史，掌握社會發展的規律，認識自己的前途。」（擇自《吳晗傳》），歷史是應該學以致用，有如一面鏡子，人人知曉便更能發揮歷史的價值。故白話口頭的筆法是有用意可尋的。在這裏，當然會有利有弊，這就要看讀者的喜好了。

以上已提及《朱元璋》有告戒統治者的作用，但在尾段那部份實在是太多私人感情灌注在內了，使文字渲染了史實。如有一段「殺，殺，殺！殺了一輩子，兩手都塗滿了鮮血的白頭劊子手，躊躇滿志，以爲從此可以高枕無憂。」吳晗在尾段多述朱元璋的過，少述朱元璋的功，好像明朝制度的奠定只是爲了朱元璋一人似的，這未免對各種政治，經濟及軍事制度的功用太過忽略了。

本書所用的資料相當豐富，幾乎所有關於明初的歷史文獻也應用了，從每節末的小註可見。例如引用了《明太祖實錄》、《高帝文集》以至劉振的《識大錄》及錢謙益的《國初羣雄事略》等，作者有意做到無一事無出處的地步，如作者在這後記中說：「在浩如烟海的故紙堆中，要逐一註明來源，是極其費事的。」一年多時間，竟有二分之一用在小註上，往往爲一條小註，翻閱幾十本書，浪費一兩天時間。作者這麼認眞的治學態度實爲典型歷史學家之表現。如寺其他同類作品比較便可知優劣，李唐著的《明太祖》，姬樹明、俞風斌共撰的《朱元璋的故事》及徐航的《朱元璋》就只是類似吳晗的形式，但少有引註，可知該項工作之艱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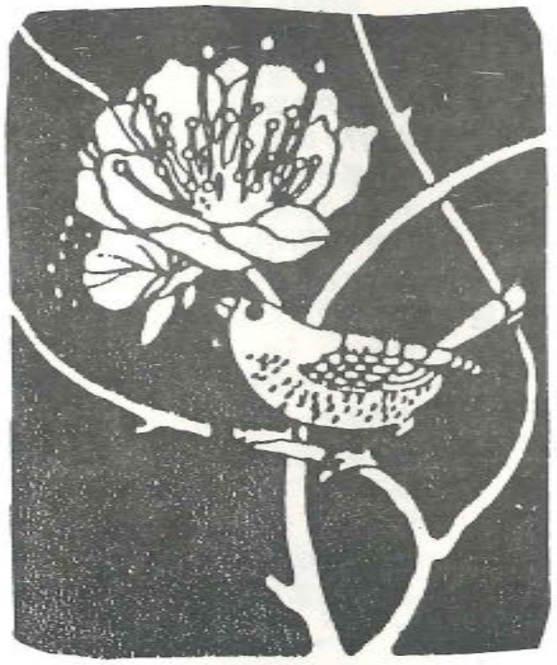
關於其他學者對《朱元璋傳》的評價；可取的有以下兩篇。

1. 近人邱樹森於《南京大學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三期曾說：「在吳晗筆下，結論是把朱元璋和歷史上所有封建的帝王比較，朱元璋是一個卓越的人物。」，「同時，朱元璋是一個歷史人物，就不能脫離歷史條件去評價，也不能用無產階級領袖的標準去要求一個古人。」

邱氏的最後一句話正是吳晗太把自己的個人意願投入歷史的後果，一定要將古今劃分得清清楚楚，這是一個值得反省的意見。

2. 陳悟桐於《光明日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謂：「吳晗權衡了朱元璋一生的功過，指出就他的功績和缺點比較起來看，還是功大於過的。他是對社會生產的發展及社會的前進起了推動的作用的，是應該肯定的人物。」

總的來說，吳晗的《朱元璋傳》實有啓發讀者對明史興趣之效，其撰寫之嚴謹，資料之充實及表達方式的流暢，實爲同題史書中之代表作，也是吳晗先生對明初歷史一次集大成的集子，尤其採用的敍事方法顯得簡潔有力，是優良史家之典範。吳晗這書是一次新嚐試，其創新精神實可對史對界另闢新途。最重要的是吳先生在本書中表現出史家之「史德」及「史識」，有「直書」之筆，爲一良史之表現。



中國的政治漫畫

黎耀强編（社會二）

以漫畫形式諷刺時弊、揭露社會和政治的陰暗面，在西方早已流行多時。而在中國，此類諷刺形式的政治漫畫在解放前亦已存在，但解放後，政治漫畫卻被政府用來作爲支持黨的政策，攻擊英、美帝國主義者和國內的「階級敵人」的工具，失去其諷刺時弊的意義。

四人幫倒台後，隨着鄧小平的上台，鼓吹思想解放，文藝界出現新的景象。黨的新領導層想借助文化界的知識份子，攻擊殘餘的左的份子、四人幫的黨羽，並支持其「四個現代化」、「改革開放」的政策。政治漫畫亦在這寬鬆的氣氛下重新抬頭。在七九年初，一些在文革中飽受打擊的老牌漫畫家，如華君武、廖冰兄等，再度發表他們的作品，而《人民日報》、《工人日報》等均予以刊載。《人民日報》還特別開了一個名爲《諷刺與幽默》的漫畫增刊，刊載一些較有水準和代表性的漫畫作品。而在七九年尾，一些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廣州等，更舉行了大型的漫畫美術展覽，政治漫畫漸漸風行全國各地，並且被冠以「有刺的花卉」的稱號，以表示其刺醒人民的意識，揭露社會問題和怪現象的作用。

圖一

自己不正看人歪　王乐天

圖二

把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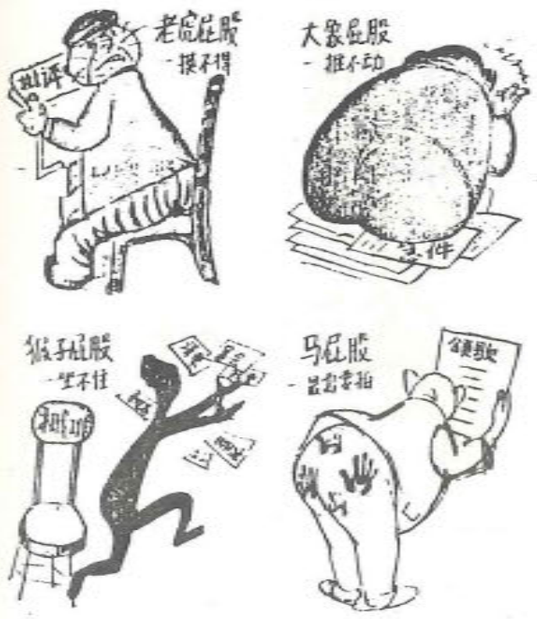
放了你，我算是白养了！

张开熙

這些政治漫畫內容上可分爲幾類。第一類是對四人幫等文革中極左份子及其餘毒的申斥。如圖一的「自己不正看人歪」中，一個極端左傾的教條主義者拒絕一個正直的幹部伸出的緩手，因爲以他左傾的角度看來，這個正直的幹部是右傾。正直的幹部手中拿着的是「馬列主義」的書，而那左傾份子手中拿着的那本破書，隱約可見到「毛澤東」三個字。他手中並且拿着一頂資產階級的高帽和一根有刺的棒子，準備用來扣別人帽子和棒打所謂資產階級份子。

第二類是表達知識份子和藝術家對創作自由的渴求。如圖二的「把關」中，一個作家或藝術家被籠困着，受到黨的保護和供養，卻失去了自由。那個看管的幹部對要求創作自由的作家說：「放了你，我算是白養了！」充份反映了黨對知識份子的政策。圖三「禁區」亦表達了在禁區林立中，作家創作時所受到的制肘。

禁区林立　圖三　陈树斌



官僚主义者的屁股　王来夏海　圖五

第三類是表達了社會中的其他人士，例如工人，對要求民主、反權威的要求。如圖四的「官理」中，一個工人對他的上司要求一些工廠中（例中決策權）的民主，卻受到橫蠻對待、亂扣帽子、更被斥爲跟黨鬧對立的資產階級份子的後果。

官　理　潭裕利

圖四

第四類，亦是最引起共鳴的一種，是對黨內的官僚主義份子和教條主義者的諷刺和批評。如圖五的「官僚主義者的屁股」中，表達了四種不同的官僚主義者。第一種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代表了不能接受批評的幹部；第二種「大象屁股——推不動」，代表了那類空佔着職位（坐着急件），卻不做任何工作的幹部；第三種「猴子屁股——坐不住」，代表了那類拋低正常工作不做，只管參加宴會、應酬的幹部；第四種「馬屁股——最需要拍」，代表了那類只喜歡下屬向其拍馬屁奉承的幹部。毛澤東雖然多次批評黨內的官僚主義作風，但從這漫畫顯示，在鄧小平時代此種官僚主義作風仍然十分流行，對進一步改革產生阻礙。飽受官僚主義作風之苦的中國民衆，看見這漫畫後，相信會發出會心微笑。

"深入现场"　　刘克勤画

圖六

圖六的「深入現場」，則諷刺了那些徒具形式，所謂「深入現場」，視察民情的官僚。圖中的三位高級幹部——書記、秘書、科長，眼見勞動人民的辛苦工作，卻在一旁抽煙，假腥腥地說：「同志們，幹得好！我們學習你們的革命加拼命！」而圖七的「頑症七例」，華君武的漫畫，加上池北偶的打油詩，對官僚們的醜態諷刺得淋漓盡致，簡直絕妙！

圖七

圖八　攻　关　　张中全

第五類，相信是最普遍的一類，是對一些社會問題和怪現象的諷刺，例如貪污成風，着重拉關係，追求物質享受等。在圖八「攻關」中，用共產黨的游擊戰術反映貪污現象的普及。他們以香煙作機鎗、洋酒作手榴彈，進攻某某單位，以圖謀取一官半職或其他好處。在圖九「三副面孔」中，一個青年提着一封介紹信來到一個幹部面前求職，他首先說「我爸爸是省委書記……」時，那幹部慌忙站起，堆滿笑容，恭恭敬敬地歡迎那青年；但當那青年接着說「的愛人的同事……」時，那幹部笑容收斂起來；到最後那青年說完最後一句「的老同學」並遞上介紹信時，那幹部別個面來，板起面孔，對他不理不采。這反映出在國內人事關係的重要性，亦表示「拉關係」普遍乘風的現象。在圖十中，一個少女拋低愛情，抱着電視機、錄音機等，高叫「我是唯物主義者」，幽了共產黨一默，並表達出現時青年們崇尚物質享樂，失去了以前共產黨員刻苦耐勞的精神，雖然口中仍然喊着自己是個「唯物主義者」。此外亦選了其他各類型較有代表性的漫畫，希望各同學細心欣賞，細嚼其內裏的含意。

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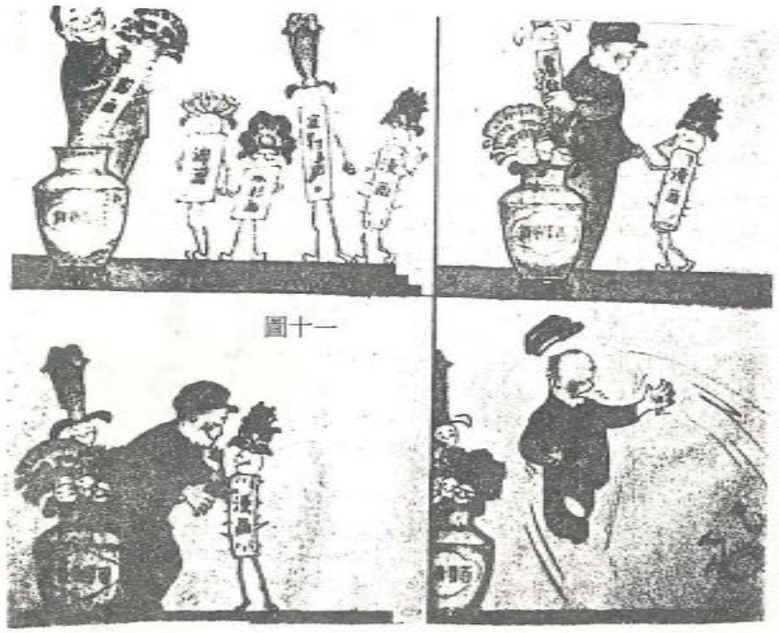
——我是唯物主义者

圖十

需要補充的是，這些漫畫大多發表在七十年代後期；隨着政府對「北京之春」的壓制、政策的收緊，這些政治漫畫亦進一步收斂，尤其是諷刺官僚的，政府爲了保持官僚們的形象，此類漫畫大多不許發表。但無論如何，此類諷刺時弊，警醒人民意識的政治漫畫，仍然深受大衆歡迎。圖十一「有刺的花卉」大概最能表達出黨對政治漫畫的矛盾心情。

酒杯一端　政策放寬
△此風要不得

筷子一提　可以可以
简孝生



圖十一

巧立名目

（大陸漫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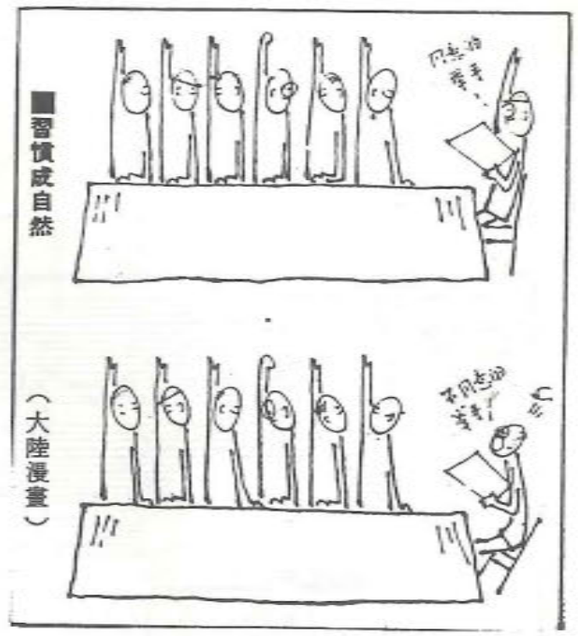
（大陸漫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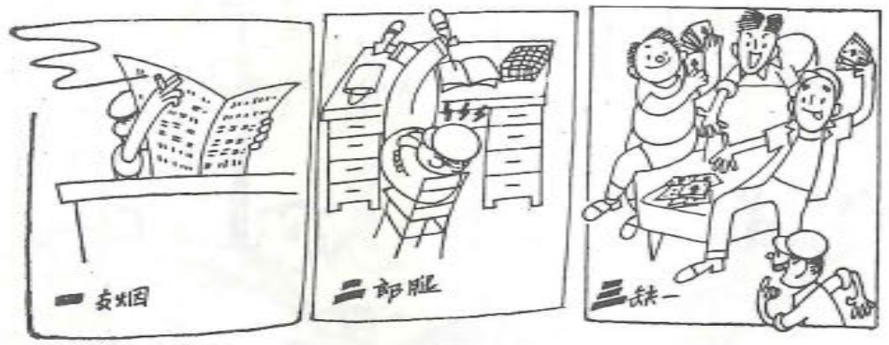
大陸漫畫：習慣成自然

習慣成自然　李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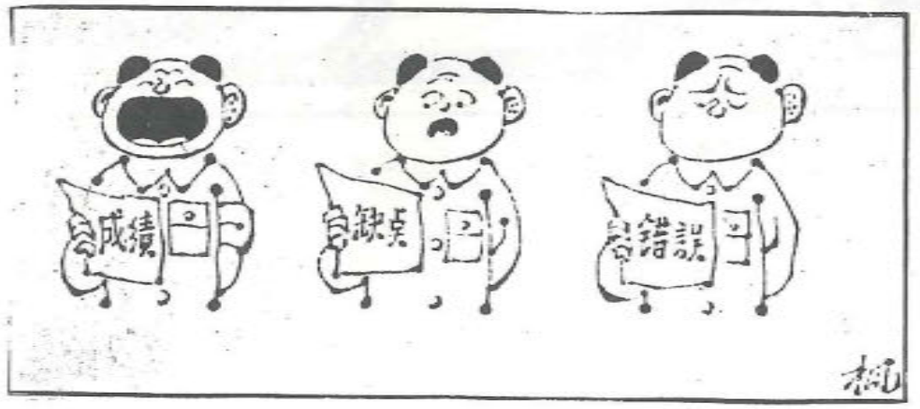
不准降落　（大陸漫畫）

王复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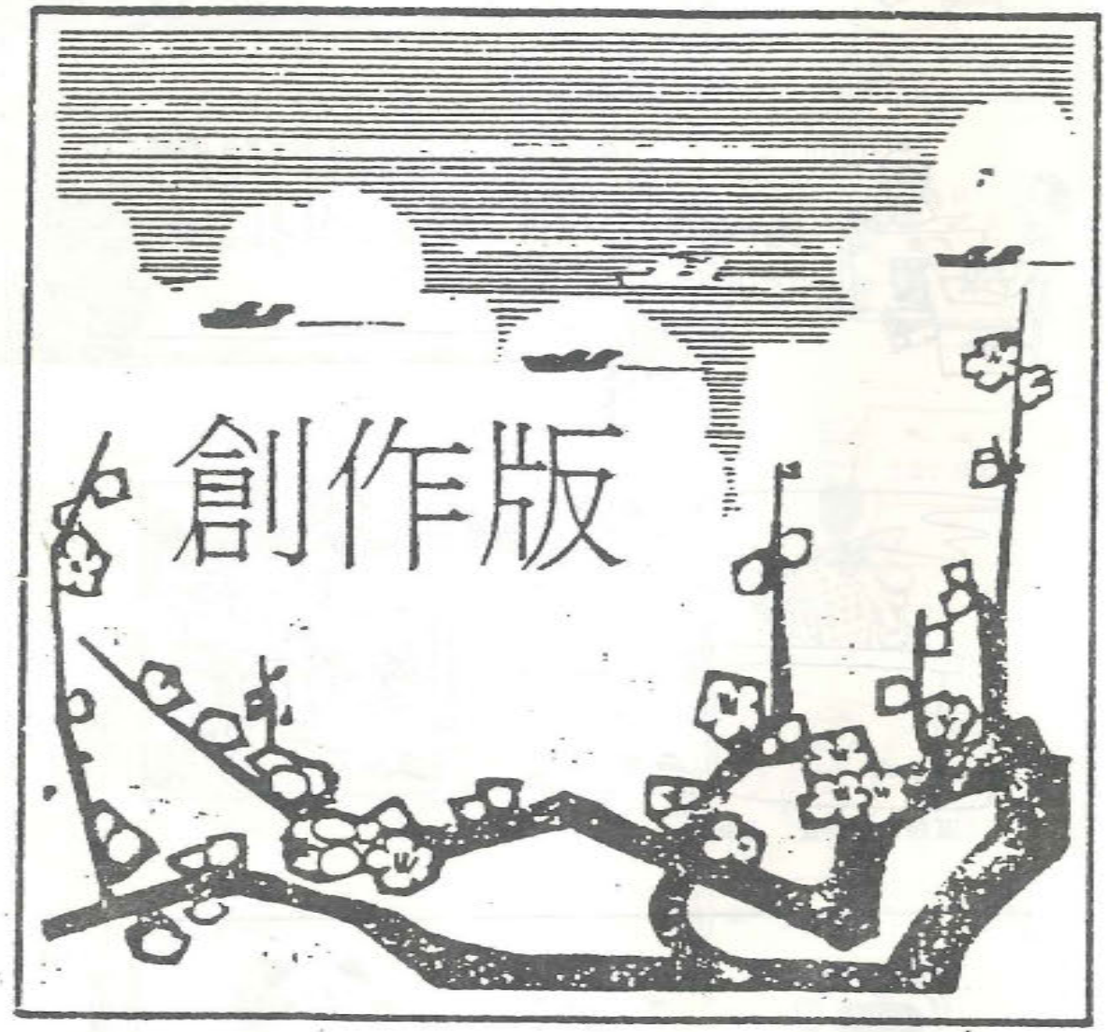




△某辦公室小景　徐鉄德



嘴的通病　王景峰



中研名字新，卻
苗嫩壯茁長，樹
學林聲譽顯，院
同窗相研磨，誠
中研地理二
陳永康詩

匯四方能
遍成蔭
期許殷
意並
正心。

陳永康

只是這樣站着

只是這樣站着
爲了妳深沉的雙眼似海
我把自己站成靜穆的岸
無音　任潮來潮去
從不因妳的洶湧而退却
也沒因妳的退却而洶湧
只是這樣站着
讓妳的反覆把此心蝕盡
溶入那無奈的相倍
相信有那麼一天
滄海變成了桑田
不安的妳　不也就
只是這樣站着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爲傷心
水　才結成冰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爲寂寞
風　才吹個不停
我不知道
是不是在妳眼中
山也是這樣青
天也這樣澄淨
我更不知道
是不是在妳心中
也浮現過
我蕭瑟的身影

其實——給慧筠

其實我要的並不多
只求能爲妳拭去淚水
當妳傷心的時候
其實我要的並不多
只求能爲妳哼首歌
當妳寂寞的時候
其實我要的並不多
只求能成爲妳看到的最後一個
當妳深宵入睡的時候
其實我要的並不多
只求能成爲妳看到的第一個
當妳清晨醒來的時候
其實我要的並不多
只求一個妳
在任何時候

其實我給的並不多
只有一雙溫暖的手
當妳傷心的時候
其時我給的並不多
只有一張沙啞的喉
當妳寂寞的時候
其實我給的並不多
只有一句溫柔的晚安
當妳深宵入睡的時候
若實我給的並不多
只有一記甜蜜的輕吻
當妳清晨醒來的時候
其對我給的並不多
只有一個我
在任何時候

雨霖鈴

「同窗騎翰與書敏相戀，未及半載，翰負笈美國，從此兩地相分，書敏飽受相思之苦。感此情懷，乃賦詞咏之，並謹祝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

依依臨別，默然無語，布谷聲徹。憑闌目送長空，飛機沒處，殘陽如血。卻剩絲絲眷戀只和自身說。最恨是，千里天涯，欲寄相思重難越。　　悠悠此憶何時絕，夜來時，不望團圓月。怎堪復記當日，空惹起，滿腔凄切。赤柱灘邊，少女情懷帶笑初揭。舊屋裏，西向窗前，桌上堆紅葉。

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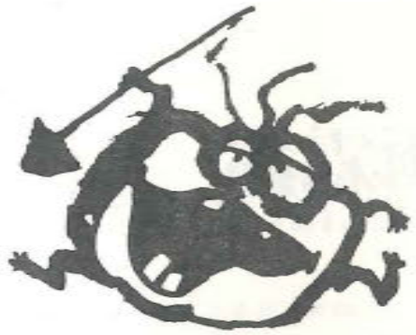
（微型小說）

「好久不見了，妳還是老樣子。」
「你却成熟了，還寫詩嗎！」
「寫，妳呢？」
「寫！」

一陣沉默之後
「記得嗎？大學時我們常來這公園的」
「記得，我們常在這裏一起讀詩，作詩，談天說地，別人還以我們在談戀愛呢。」
「眞好笑，他們不懂甚麼是異性之間的純友誼。」
「是，眞好笑。」
一陣沉默之後。
「我隨便問問，有男朋友了嗎？」
「有，你呢？」
「有。」
「……」
一陣沉默之後。
「其實我也不知道愛不愛她。」
「什麼？」
「可以說我根本不愛她！」
「其實，我和他也沒共同語言」
一陣沉默之後。
「其實我一直……一直愛的是…是妳！」
「……」
「……」
「我也是！」
再也沒有沉默。

聽聽瘋人語

張少强（社會一）



不知從何而始，流行了「食腦」這一個講法。自有了這一個講法之後，管他是快將壽終正寢的也好，剛巧牙牙學語的也好；都幾乎識說：

「你猜我是傻的嗎！其實我是『食腦』的。」

雖然，這也許只是俗語上的口頭禪；但筆者總覺得這個講法是有很深厚的意思。這是由於自古以來，人類都是「食腦」的，而不是「食力」的原故……

據說：盤古開了天地之後，大地上便出現了一羣蠢物。說他們蠢；他們亦的確很蠢。因爲，論氣力，他們不及野獸般大，論身手，又不及野獸般好；論板斧，則沒有如野獸般的獠牙指爪；若論求生的本能，他們眞的是低得極爲可憐。所以，他們雖然耗盡了全力去覓食，還是出現不夠食的問題。

既然，出現了不夠食的問題，就迫使他們動一動愚蠢的腦筋來解決這個問題。終於他們想出了一個勢利的方法；就是向弱小動物的身上打主意。

偏偏他們的胃口又不少，縱是食光所有的弱小動物，仍是不夠。他們只好又再動一動愚蠢的腦筋，再想出一個倍加勢利的方法，就是向同類的「弱者」身上去打主意。從這時開始，「弱者」就漸漸的被「强者」食掉了。

可是，有了這樣原始的「食腦」構思，還是未能作爲長遠計。理由是在於弱者的肥肉，始終是塡不滿强者的肚皮。這絕不是由於弱者的數目少，而是强者的胃口，實在太大。於是乎一些强者中的强者，便再度使出高一層的「食腦」方法；組織起若干數量的同道，成爲一個個的部落，一起去食弱者，或是沒有勢力的强者（其實相較之下，他們都變成了弱者）。自此以後，强者食弱者，就成爲了一個生存的「必然之勢」。

時光一轉，一個個的部落，都變成了一個個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個的國家後，他們便感到「蠢物」這個名字太難聽，好刺耳；於是他們便爲自己改了一個美麗的名字，叫做「人類」。亦即是說自己是「萬物之靈」，唯我獨尊的意思。

然而，唯我獨尊的「萬物之靈」，仍是要食的。改了一個美麗的名字，亦不等如他們的行爲，就可以美麗起來。事實上，他們仍是跟着「必然之勢」來生存，他們仍是在强者食弱者；只不過是「食腦」的方法，變得越來越高明吧了！

這時候，他們已不想像以前那樣小規模地食，而是想大規模地食。爲了達到這一個目的；他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明確分別誰是强者，誰是弱者。因爲要有了强弱者的分別後，他們才可以重申這個生存的「必然之勢」，才可以大規模地食人。

有了這樣進步的「食腦」構思，他們便決定嘗試用「皮膚」來分，認爲：有色的是弱者，無色的是强者。轉瞬間，這樣的講法，已甚爲見效，因此他們便急不及待的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食人行動。就是歷史上，無色食有色的慘劇。

後來，那些被人食的有色弱者，由於被人食得多了，也漸漸學會用「食腦」的方法來對抗。不久之後，他們也强了起來。而那羣曾經自封爲無色的强者，亦再不能用這個「食腦」的構思來食人。

這樣的「食腦」構思既已不靈，他們便再度換轉另一個「食腦」的構思，就是用「國家」來分强者，弱者。

這一次，他們認爲：大的，先進的國家是强者，小的落後的國家是弱者。有了這樣的講法，照慣例來說都已經足夠重演這個「必然之勢」。但他們爲了美其名，他們便不再叫這些行爲做食，而叫做「解放」。結果，就出現了兩次背着長槍，帶備炸藥的開放行動。

據聞他們「解放」了兩次，還想「解放」第三次，可是大家都不敢。因爲有了第三次，就沒有可能會有第四次。

無論怎樣都好，這也算是好消息，至少可以有番一段安靜日子。

奈何！好景不常，無端地又有了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講法。早陣子，更有一個自稱爲第一世界的强者，大咳地咬了一個第三世界的弱者一口，還說只是來重組第三世界國家的新世界秩序。那麼，現在不是已有了强者，弱者之分嗎？是了！是了！這是再度重演「必然之勢」的新「食腦」構思的先兆了，很恐怖啊！

原來人類的世界，眞是一個「食腦」的世界，只要你「食腦」，食完人，殺完人；都可以無有怕；不但可以無有怕，而且可以說自己食得好，殺得對。

究竟何時會有一個沒有「必然之勢」的世界出來？我很渴望，但我不敢去想……

這個遊戲……

微言（經濟二）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遊戲，人人都懂得怎樣玩。不用學，不用別人教。明白的已經明白；不明白的會明白，糊裏糊塗的很快明白，遊戲規則應該很嚴格，全按照遊戲的基本法行事。主持人要一絲不苟，如臨大敵，不容出錯。參與者也必須一本正經，不允許有任何越軌行爲。名正言順，是爲了「公平」大前提。遊戲開放給所有有關人士參加，而名義上有關人士都必須行使權力。可惜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浪費他們認爲不應該浪費或者應該浪費的時間。而願意的可能喜歡浪費，也可能不喜歡浪費。總之，這個遊戲沒有人會輸，也沒有人需要付出代價。遊戲結束時只有勝利者，和勝利的喜悅、歡呼。看不見憂愁、沮喪，也許隱約聽到遠處傳來的竊竊私語和喃喃自語。「是這樣嗎？」「我看大有問題，但又找不着端倪」「誰對？誰錯？」「有人錯嗎？唔……沒有」「有人對嗎？又沒有」許多人心裏都有一個疙瘩解不開，也懶得……寒暑、寒暑，都渾渾沌沌地敷衍了事。

不知遊戲進行了多久，沒有人去問，更沒有人刻意去思索。不過它今天似乎起了一抹變化。這變化很明顯，可好像沒有人察覺是什麼。是不忍拆穿，還是無聲勝有聲。從種種跡象表現，人們是體會到這一微妙變化。氣氛熱鬧了？刺激了一點？抑或緊張了起來。各人不知不覺地從大氣中嗅到這股味道。人們開始注意，記起沉澱在他們蓄憶深淵的權力。他們認眞起來，究竟他們已瞭解變化，或者故意探測勝利與失敗的分別。不知道變化會維持多久，可能只此一次便告恢復舊觀。無論怎樣，它總是留下了一點兒什麼。

戰爭

誓掃匈奴不顧身
五千貂錦喪胡塵
可憐無定河邊骨
猶是春閨夢裏人
（陳陶　隴西行）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君莫笑
古來征戰幾人回
（王翰　涼州詞）

秦時明月漢時關
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
不教胡馬度陰山
（王昌齡　出塞曲）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
（杜甫　兵車行）

自古以來，關於戰爭的詩歌如恒河沙數。昨夜無聊，淺讀唐詩三百首，就發現以上四首詩歌。

有人說人類最古老的敵人是死亡，而我覺得，對生命的最無情之嘲笑，便是戰爭。最古老的敵人與最無情的嘲笑如影隨形，他們之間的關係，仿如抽刀斷水，不可分割。問題在心中盪漾，使我朝朝暮暮年年月月的思量，惆悵。我有一點酒醉後的茫然！

超人（經濟二）

中東近期的戰爭，令我懷疑人類是否眞的依循進步的方向發展。我們終日喊着「要吸取教訓，發展未來」，然而，所有的教訓都添不了人類的幸福；我們讓歷史悲劇如日之於夜，不斷發生。不好的已如昨日死，我們並不喜歡回憶傷心的往事，但我們也必須眞眞正正的吸取教訓，避免傷心的往事一再重演。重演比回憶更使人感到悲哀啊。

進步一詞曾被劍橋的高級學者們，花了很長的時間討論。從現實，我已知道什麼是不進步了！滔滔的雄辯無助於確切的了解，高深的學識有時只會模糊視綫。不進步已令人失望，退步則猶覺哀痛！當今豈止不進步，以退步形容之，就算不適當，也算可以接受吧。人類最古老的敵人眞的比以前來得更密，把門叩得更響；令人詫異的，卻是人類自己邀他前來。人是怕死的，然而，爲什麼會有這般矛盾的事呢？窗前的明月與頭上的星宿都給不了我答案。

一股子無奈的情緒忽然湧起，逼得我心酸欲哭。

三月十七日星期四晚，國際台播放了一套奧斯卡名片「晴天恨海」，看完後心情久久不能平伏。男主角在一次大戰後倖存性命，因而感到人生充滿迷惑與不解；過去他所堅守相信的，都失去了光彩與價值。他的思潮番起了滔滔的巨浪，白色的浪花只增加他的苦悶。他追尋，他摸索，他改變以往的生活方式，貧窮的低下層生活。他要扎實地反省生命。此時，他的未婚妻便憤怒地除下主角給她的定婚戒指；主角說：「將它戴在另外一隻手上吧，我們還是朋友。」

我爲主角的果斷與氣量喝采。主角知道他的未婚妻並不了解他，勉强挽回這段婚姻也多是以悲劇結束，所以他不費辭勉强挽留他的未婚妻，卻還立即作出決定說「我們還是朋友。」這表現了主角的果斷。主角心胸廣闊，不單不與未婚妻反目成仇，反而將定婚戒指作朋友之間的禮物贈與她，這顯示了主角的氣量。如斯英雄，如斯氣魄，試問當今能有幾人！自當使天下男兒所景仰，使萬世女子所鍾愛。

片中的對白擲地有聲。影片揭示了三十年代人們的思想——人們於一次大戰後，感到迷惑，感到有反思生命的必要。然而，大約十年後，一套超過奧斯卡級的悲劇在全球公演——二次大戰爆發。全球的生命再次跌進惡夢的深淵。

我們已從深淵解脫出來？自一九四五年，戰爭不斷爆發，影響較大的有韓戰、越戰、兩伊之戰，伊拉克之戰等等。我們親眼目睹最大的悲劇不斷重演，悲劇之謂最大，不在其結果之難堪，乃在其形成過程與產生的原因——人類自編自導自演，還當上道具制造人員。

自古至今天氣新，幕幕戰爭多動人！監製、導演、演員，編劇與觀衆一同聲淚俱下，悽愴可憐。可惜，沒有人爲這些最大的悲劇鼓掌，徒有文學家們作五內俱焚的叫喊。

愁苦，無奈充滿了整個世界。

爲什麼？人們爲什麼互相殺戮？名律師丹諾說：「……我們不要忘記歐洲的戰爭。我不知我是否瘋狂，有些時候，我想或許我是的。我加入這個瘋狂與絕望的大衆叫囂，我推動人們去戰、戰、戰。反正我自己是安全的，因爲我太老了，不至於去了。我們在幹些什麼？對，還是錯？合理，還是不合理？我們今天不能討論。但戰爭在改變這個世界卻是事實。大家殺紅了眼。」

希望，人類還是有希望的。丹諾繼續說：「我祈求的是未來，我期望的是終有一日到來，恨與殘忍不再控制人們的心靈。我們可以由推理、判斷、瞭解及信仰而學習到所有生命都是應該拯救的。而慈悲是人類最高禮讚。」

仰望蒼穹，沉默的，沒有一絲聲音。淚，隨它灑吧！

螢光屏裏的生命

新青年（歷史二）

一直以來，我只將生命當成一場戲劇。天天的面對螢光幕，天天的看着演員在螢光幕裏演戲。長久以來，單方面的溝通，使我變得冷漠。我像是一個旁觀者，看着面前眞實的事物，彷如看電視。我彷彿已成功地將自己抽離了整個眞實世界，週遭的一切對我來說，已全無關係。我就只是一個坐在電視前的觀衆，看着面前人影閃動，只覺色彩斑駁，而全無感覺。

縱有感情，我亦不知可向誰傾訴，是電視前的劉嘉玲嗎，是劉德華嗎，是電影裏的周潤發嗎，還是Mark哥，豪哥，小蝶或阿郎。他們有反應嗎？他們看見我流淚嗎？他們聽到我爲他而高呼拍掌嗎？他們是聽不見，看不見的。他們仍舊是演他們的戲，甚至觀衆在螢幕前爲他們痛不欲生，他們仍舊是演他們的戲。

看者全無感覺，演者全無感覺。兩者皆茫然，兩者皆孤獨，兩者皆可哀。

今天，我又如常坐巴士返家，如常看着面前一個又一個陌生人在做戲，他們對我已無相干，我樂得安心孤獨。望着坐在目前的小女孩，我只感到她是電視上的小童星，一舉一動雖然天眞可愛，然而我只將她作爲一件藝術品欣賞，而不是那種發自內心對人的憐愛。望着望着，我越覺遠離。

聽說任何動物皆需要活動空間，不許別的動物侵佔。然而當社會發展，越來越多人要塞在一個城市裏，一幢大厦裏，實際的空間減少了，這逼使人類要自築圍牆，避免別人窺視生命。因此當人類實際距離越來越近時，思想的分歧就越來越遠。巴士上與你肩並肩相坐的人實際是活在另一個空間的人。

突然，面前的小女孩叫了我一聲，我雖然是聽到了，但我無動於衷。她繼而向我伸手，給她手中的玩具熊與我，但我迅速恢復了理智，這不是眞實的。電視的角色無可能超越螢光幕與觀衆接觸的，這實在太恐佈了。這就只有天眞的小女孩，才希望與電視接觸。當她漸漸長大，她會發覺自己原來是何等的無知。

我是成人，我不會再存有這樣的希望，正如我不會害怕恐佈片一樣，因爲我只是旁觀者，一切與我無干。

汽車到站了，我下了車，向巴士上的小女孩回望了一下，發覺她竟也看着我。

醒來吧！

張國樑（經濟二）

同學們，生之爲何？你們有沒有想到自我們出生以至現在天天上課，夜夜挫書，究竟爲了什麼？「啊！爲了讀好啲書，攞個Degree，將來可以找份好工！」這個同學雖然未能給予答案，但還懂得要好啲書才「攞」個Degree。然而找份好工又爲何？「咁簡單都問，爲了生活嘛！」請問生活爲了什麼？爲了什麼？爲了什麼？

「起床、坐電車、在辦工廳或工廠中的四小時、吃飯、坐電車、勞動的四個小時、吃飯、睡覺，就這樣以相同的步調重複着星期一、二、三、四、五、六，而塡滿了人生中某一時期的大部份。然而有一天，忽然生出『爲什麼』的疑問，在驚異包圍着倦怠之時，一切開始了……。（《異鄉人》‧卡謬）

"Why? Well, and then?" (My Confession, Tolstoy)

不知同學們有沒有如以上那段引文般的感受呢？相信「爲什麼」的疑問乃是千古同有，古今同問。沉睡於「起床，坐電車……」的生活的同學醒來吧！勇敢地面對這個問題——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如果可能的話，你是否願意活多次？

「不用急，回答問題前，等我們先厘清及定義問題中的關鍵字眼——意義的意義吧！」語理分析家李天命如是說。

請問甚麼是「厘清」、「定義」的意義呢？李天命先生你那一套很有用，但不是萬靈藥！你不知道維根斯坦曾經說過：「冰最乾淨，毫無摩擦，但冰上不能走路！」嗎！

李天命的一招，好不容易地化解了。返回這條問題吧。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The moment a man questions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he is sick ……" Freud如是說。

如果理解病人有不尋常問題的人，那麼我們都是病人！但Freud大蓋都無法醫治的了。關於人生的意義這問題總體上有三家說法：

宗教家認爲人生意義乃在於人的生命以外。

人文主義者認爲人生意義乃在於人本身有什麼目標及與其相關的行動。

虛無主義者否定問題，他們認爲生而荒謬。

說到現在，不知同學們是否有Tolstoy於My Confession中所述說的感受？Tolstoy說"In my search after the question of life I experienced the same feeling which a man who has lost his way in the forest may experience."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各家有各家的說法！甚至有些人認爲人生是無意義！究竟是什麼事呀！」同學們請冷靜下來。急躁的腦袋就如海水之波濤洶湧，船隻怎能航行，思維怎會發揮作用呢！現在一時想不到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不要緊，只要你們中從現在開始，眞正存在「爲什麼」的疑問，那麼就正如卡謬所說：「一切開始了……。」就算最終找不到生命的意義，在你們蓋棺冥目之前也至少應該洞明"It is better to have searched and lost, than never to have searched at all."（《荒漠行》，余達心）

我認爲「人生的意義是什麼？」這問題本身已包含答案的種子。

人生的意義相信在於自覺地追尋索人生的意義——我認爲這不單是人生的意義，還是人生中最高深的學問，現在就開始着手研究這門學問吧。圖書館就是時空與社會，生命是圖書證（借書期由即日至死前一瞬）。研究這門最高深的學問的結果可能是令人沮喪的，但始終都是這句"It is better to have searched and lost, than never to have searched at all."

那些現在或未來認爲人生是沒有意義的同學請聽尼采高歌：

「好吧！人生如果沒有意義，我就賦予一種意義。我就用自己的雙手，創造有意義的人生！一個值得展臂歡迎再來一次的人生！」

願我們都能創造一個「……值得展臂歡迎，再來一次的人生。」

卑之無甚高論，詩經有云：「……如琢如磋，如琢如磨。」鄙人希望同窗友好不吝多加批評，指正。

歉

浪子（社會二）

每當看見她的照片時，我總有一種內疚感覺。

三年前我在大學入學試中失敗了，換來的是一年慘痛的自修；與此同時，我與伊雲那段撲朔迷離的感情關係亦無疾而終。就在這心靈極度空虛和精神狀態最孤寂的時候，另一顆溫暖的心直闖進我的心坎裏。

情人節晚，我與露莎躺在沙灘上點算那數不完的繁星。一顆又一顆之後，她半醉半夢地伏在我的胸膛上。我眞希望時間先生就此停下腳步，亦希望愛神邱比特的金箭不要離棄我們，更希望一切一切美好的事都永歸我倆。

不幸的，我開始厭倦了三年來公式化的拍拖生活，週而復始的看戲、行街、吃飯和接送回家令我再三思量究竟我們應否繼續這樣。雖然在別人的眼中，我是一個幸運的人，有一個清麗脫俗，性情和柔的女朋友，但我自己總覺得有另一浮影常徘徊在我的最心底處。

一個早上，一個本來極爲普通的早上，我在上學途中，在擠湧的地鐵車廂內再遇見她。四目交投後是一瞬的沈默，她先大方地打開這沈默的匣子，淺談自己在大學的生活，補習時孩子的頑皮和許多我其實不想知但又很想她講的事情。

車門打開了。她向我說聲再見然後步出車廂。

我趁車門未閉之時，拿出不知從哪裏來的勇氣，叫道：「伊雲，妳明晚有空與我吃晚飯嗎？」

她回頭並遲豫了一陣。

列車不近人情地慢慢離開月台。

她點頭。

心底湧出來的欣喜令我掩飾不住嘴邊的微笑。我好像找到那徘徊的浮影了。

偷偷摸摸的約會教人在犯罪似的，每次與伊雲在街上同行時，總害怕碰見露莎或其朋友，就像非法入境者害怕遇見警察一般。雖然懊悔之感無時無刻都在我心裏激盪，但我依然沈醉在與伊雲的世界裏。

露莎開始感到我倆之間出現隔膜了，她盡量騰出僅餘的時間陪伴我，並付出眞摯的情感關懷我。多張溫馨的聖誕咭、新年咭和生日咭，與及多封情話綿綿的書信，都表達了她對我那海枯石爛的不變感情。由此，更加重我的罪惡感和內疚感。

又是一個情人節的晚上，又是那個我們定下海誓山盟的海灘，我和露莎再一次默默步過。演奏着「**Unchained Melody**」的海浪聲，不協調地夾雜在我說的「不如我們分手罷」這七字裏；而潮水則在洗刷着我們曾深深留下的腳印。

露莎若無其事地拉着我的手，並叫我與她一起躺下，再點算一下天上的繁星數目究竟與當日的有沒有分別。一顆又一顆之後，一滴又一滴的淚水沾在我的衣襟上，滿眶熱淚的她笑說：「星兒的數量沒變，你卻少了一顆對我的心。」我本想對已伏在我腔膛哭泣的她說一聲「對不起」，但一陣涼風吹過後，她已疲倦得昏睡了。

她疲倦於這三年來對我的一切。

我致歉於這三年來對她的一切。

編後語——
姍姍來遲的中國研究學會會刊創刊號

黎耀强

中國研究學會會刊創刊號在多番催促（並非萬衆期待）下，終於脫期（並非如期）出版了！

說到本會刊爲何要延遲到五月中才能出版，我相信我也沒有什麼辯護的說話可以解釋，即所謂難辭其咎也。但我希望你們在罵我前，考慮以下兩點因素：

第一，我是在大約四月初才開始籌備本會刊的出版事宜，這並非我懶惰之故，而是我一向沒打算負責此項總編輯的工作，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我才「心甘情願」背上這份吃力不討好的差使，固中因由我也不想細說，但我自問我已全力做好這件工作。

第二、是稿件的收集問題。首先在三月底截稿爲止，我基本上沒有收過一份同學的投稿稿件。因此，我遇到的最大困難並非從大量稿件中挑戰合適的出來，而是要在手頭上沒有一份稿件的情況下出版一本會刊。在苦苦思量下，終於只好找一些份量十分重的方法來收集稿件——、就是訪問講師，然後整理他們的訪問稿；二、把本會的公開講座的講稿整理作爲本刊的專題出版；三、利用我本人狹窄得可憐的人事網絡，情商一些稿件。

就在這種頗艱難的情況下，終於勉强出版了一本似模似樣的會刊。

但是內裏的問題仍然不少，尤其是一年級同學的稿件極之缺乏。另外，原本希望進行的一次大型的課程意見調查報告，亦因在過於倉促下被迫放棄了。相信這件工作要由第二期會刊來完成了。

雖然如此，但我相信本會刊的份量和質量，比起其他學會的會刊，有過之而無不及。首先，在頁數方面，除了《學生報》和《國事年刊》外，本刊可算數一數二。質量方面，雖非篇篇皆上品，但是出自中研同學之手，亦殊不簡單，有一定的份量。因此，並非慢工才能出細課。

最後，我想對某些同學致以特別的謝意，沒有他們的熱情幫助，會刊的出版相信會遙遙無期。第一位是張國樑同學，他可說是被我拉落水的。個多月來爲本會刊不辭勞苦，從攝影、訪問、寫稿、接觸講師，以致受我的氣等，都毫無怨言，幫了我很大的忙。第二是四位一年級的執行編輯，經常被我橫蠻地「點紅點綠」，訪問、整理訪問稿、對稿件等，都以最敏捷，最好的成績下完成，我想在這裏稱讚你們一句——你們很可愛！第三位是鍾謙同學，要在趕赴海南島的情況下抽空替本會刊設計出如此高水準的封面，令人佩服。最後的兩位是會長梁韋洛同學和外副謝盛昌同學，沒有他們的多番催促和幫助，相信以我的習性，本刊的工作會無限期的被我拖下去。

無論如何，本會刊的出版已成歷史塵跡，成績要由各位同學來判斷。但願會刊第二期能「百尺干頭，更進一步」！

中國研究學會會刊創刊號
編輯委員會名單

總編輯　：黎耀强（社會二）
執行編輯　：董志輝（經濟一）　梁碧華（社會一）
　　梁佩珠（地理一）　王芸蕾（社會一）

封面設計及
美術設計　：鍾謙　（地理二）
攝影　：張國樑（經濟二）

工作人員　：謝盛昌（歷史二）
　　梁韋洛（社會二）

鳴謝

周全浩博士　梁韋洛　鍾謙　張少强
丁　偉博士　張國樑　陳永德　林毅
胡敦靄先生　謝盛昌　楊少潤　羅少文
陸昭明博士　陳莊　關祺亮　陳永康
林啟彥博士　麥榮康　林權　黎劍釗
丘延亮博士　盧定偉　周澤民

CHINA
HKBC
中國研究
STUDIES